

什么是新时代“工匠精神”

郑大发

新时代的“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协作共进的团队精神、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是根本,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是核心,协作共进的团队精神是要义,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是灵魂。

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爱岗敬业,是爱岗和敬业的合称,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爱岗是敬业的基础,而敬业是爱岗的升华。具体来说,所谓“爱岗”,就是要干一行,爱一行,热爱本职工作,不能见异思迁,站在这山望那山高。所谓“敬业”,就是要钻一行,精一行,对待自己的工作,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笔者调研中发现,凡是获得“工匠”和“劳模”荣誉称号的工人,都是爱岗敬业的典范,很多人都在本岗位上工作了二三十年之久,干出了一番事业。所以,“工匠精神”最根本的内涵,就是“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

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顾名思义,精益求精,是指一件产品或一种工作,本来做得很好了,很不错的,但还不满足,还要做得更好,达到极致。“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是“工匠精神”的核心,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工匠”,就在于他对自己产品品质的追求,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永远在路上;他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反复改进产品,努力把产品的品质从99%,提升到99.9%、再提升到99.99%。对于“工匠”来说,产品的品质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笔者在调研中,最深感受之一就是,追求极致、精益求精,是获得各类“工匠”荣誉称号的工人的共同特点,这也是他们能身怀绝技、在国际、全国或省的各种技能大赛中夺金戴银的重要原因。

协作共进的团队精神。如果说“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是传统的“工匠精神”中具有的内涵,那么,“协作共进的团队精神”则主要体现于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之中。因为和传统工匠不同,新时代工匠尤其是产业工人的生产方式已不再是手工作坊,而是大机器生产,他所承担的工作,只是众多工序中的一小部分。比如“复兴号”列车,一列车厢就有三万七千多道工序,这三万七千多道工序,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由车间或班组亦即团队协作来完成。团队需要的是“协作共进”,而不是各自为战。因此,“协作共进的团队精神”是现代“工匠精神”的要义。所谓“协作”,就是团队成员的分工合作;所谓“共进”,就是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共同进步。

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和“协作共进的团队精神”一样,“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也是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内涵之一,甚至是新时代“工匠精神”的灵魂。传统的“工匠精神”强调的是继承,祖传父、父传子、子传孙,是传统工匠传承的一种主要方式,而新时代的“工匠精神”强调的则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因为只有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推动产品的升级换代,以满足社会发展和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有无“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是判断一个工人能否称之为新时代“工匠”的一个重要标准。

当前,我国正处在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培育和弘扬严谨认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对于建设制造强国具有重要意义。而只有对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形成共识,才能树匠心、育匠人,为推进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本文来源于《人民政协报》2018.8.30,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培黎通讯

2023年第1期(总第40期)

主 办：兰州城市学院
编 辑：路易·艾黎研究中心
鸣 谢：培黎老校友
顾 问：周起秀 聂广涛 王自刚
李建平 刘世仲 王延义
刘铁林 杨作俊

编委会

主 任：许尔忠
副主任：石 虹
编 委：冯 驱 刘国忠 张雷涛
刘晚霞 白晓霞 许立业
董 沼

编辑部

主 编：石 虹
编 辑：董 沼 曾桐铭 焦晓霞
宋 福 郭忠宁 聂 炜

赠 阅：培黎校友、艾黎研究人员
编辑部地址：兰州市安宁区街坊路
11号

邮政编码：730070

电子邮箱：519187952@qq.com

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网站：

<http://rarc.lzcu.edu.cn>

印 刷：甘肃日报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务分公司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准印证号(甘)LK6201019

印数：500册



欢迎关注路易·艾黎研究中心官方微信

目 录

卷首语

什么是新时代“工匠精神”…………… 郑大发(1)

高山仰止

英特纳雄耐尔——记路易·艾黎同志

…………… 叶君健(4)

深厚友谊

黄华回忆接待斯诺第三次访问新中国 …… 黄华(11)

专家特稿

功绩卓著的工合战士普艾达 …… 吕宛如(17)

国际友人

新西兰友人贝特兰的中国抗战情缘 …… 牛玉林(19)

深切缅怀

辉煌70年：致敬《中国建设》杂志创刊老前辈 …… (24)

学术交流

讲好艾黎与少数民族的故事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周多星(28)

史料钩沉

关于新西兰友人艾启赫的四份史料 …… 秦泉安(32)

口述历史

工合往事：陇上曾产百万条抗战军毯 …… 王峙口述(36)

工合之窗

和平红色“工合”：抗战时期党组织的保护者

…………… 凌 丽(40)

“工合”双石铺事务所的成立及其贡献 …… (45)

红色印记

代表新的中国的大使——路易·艾黎

…………… 弗兰克·罗伯特森(47)

何克专栏

英国人乔治·何克：把一切献给培黎学校 …… 吴耀明(52)

艾黎足迹

新西兰莫瓦蒂亚河谷艾黎的小木屋 …… 刘国忠(54)

培黎纪事

缅怀路易·艾黎老师 周启秀(59)

照片档案

中国工合金华机械五金生产合作社证章 蔡道斋(62)

文物故事

路易·艾黎的新西兰共产党员党费证 赵谦奎 陈琴(64)

封面题字 俞 宏

封面 路易艾黎在内蒙古(1985年)

封二 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

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 习近平向“友谊勋章”获得者伊莎白·柯鲁克颁授勋章(图1)

青年时期的伊莎白·柯鲁克(图2)

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奠基人伊莎白·柯鲁克(右)与丈夫大为·柯鲁克在在北外校门口(1994年)(图3)

情系中国(图4)

作家谭楷创作 30 多万字的报告文学《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讲述了伊莎白的百年人生故事(图5)

伊莎白(右)与其子、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特邀顾问柯马凯(左)在一起(图6)

封三 中新友好的历史回眸

19 世纪 60 年代在新西兰奥雷普基(Orepuki)的中国掘金矿工。(图1)

收藏于新西兰国家图书馆 1910-1911 年&1911-1912 年的中英文日历。(图2)

1947 年,身着传统旗袍的中国女性与匈牙利钢琴家莉莉·克劳斯(Lili Kraus)在惠灵顿市政厅一场音乐会上的合影。(图3)

1973 年 3 月 31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访的新西兰贸易部长兼副外长约瑟夫·艾·沃尔丁(Joseph Walding)和以他为团长的代表团。(图4)

1973 年 9 月 20 日,新西兰首任驻华大使布莱斯·哈兰德(Bryce Harland)向中国国家代主席董必武递交国书。(图5)

新西兰首任驻华大使布莱斯·哈兰德在 1973 年会面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图6)

封底 位于湖北省洪湖市江滩公园内的路易艾黎雕像(2017 年)
中国人民对外友协林松添会长和新西兰外长马胡塔共同为路易·艾黎雕像揭幕(2023 年)

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有不少国际朋友给予我们宝贵的支援。但像新西兰的路易·艾黎那样,为中国人民工作的时间那么长、活动范围那么广、对我们了解得那么深的朋友,却是不多见的。而且,艾黎同志已九十高龄,今天仍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孜孜不倦地工作,更是难能可贵。

艾黎同志从三十年代在上海就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忠诚支持者。抗战期间,他组织的“工合”运动,为我后方生产救亡作出了重大贡献。四十年代他创办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从农民子弟中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耐劳的技术人才,他们至今仍在各生产战线上发挥骨干作用。他还是个多产的诗人 and 作家,有六十多部作品在世界许多国家流传。他积极投身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以及他杰出的社会活动,更使他在国际上赢得了崇高的声望。艾黎同志六十年来为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促进中国和新西兰以及各国人民间相互了解和友谊的事业中起了独特的作用。

我从一九三八年在汉口认识艾黎同志,至今已近五十年。对他的人品我一直是很钦佩的。周恩来同志在解放前后都经常关心艾黎同志的工作和生活,认为他是中国的一位久经考验、意志坚强的朋友。艾黎同志在长期的斗争中不怕艰辛、不计得失,把一腔热情和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中,始终坚定不移,真不愧为一位无私无畏、襟怀坦荡的伟大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由衷地尊重他、爱戴他。

在纪念四月二十一日艾黎同志来华六十周年的前夕出版《艾黎自传》的中译本,是值得祝贺的大事。这本回忆录记述了他一生的丰富经历,展现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变迁和各时期的社会风貌,是给中国人民,特别是为青年一代留下的一本历史活教材和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以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鼓舞着人们为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不懈。

——邓颖超《艾黎自传》序言

英特纳雄耐尔——记路易·艾黎同志

叶君健

编者按：深受广大少年儿童喜爱的已故著名作家叶君健，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新长征路上，革命青春焕发，用细腻生动的笔触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创作了长篇人物故事《英特纳雄耐尔——记路易·艾黎同志》，其目的正如作者本人在《叶君健近作·后记》中所说：“为了给少年儿童提供一点有关国际主义教育的资料”。

这篇作品最初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5期上，后收录在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6月出版的《叶君健近作》一书中。从作家的角度专门讲述艾黎故事，这在路易·艾黎研究资料中极为罕见而且弥足珍贵，现予续载39期，以飨读者。

五

1935——1936年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一个阶段。自从1929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恐慌发生以来，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无法克服的地步。作为摆脱困境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一天一天地逼近。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从事战争的“轴心”。它们对内公开用恐怖手段来施行法西斯专政，对外则明目张胆的扩大侵略。意大利已经占领了埃塞俄比亚，德国则公开干涉西班牙的内政，日本对中国也在进一步扩大侵略，由关外调集大批军队侵入关内，威胁天津、北京。蒋介石一心要打内战，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接着日本又煽动河北省东部香河、昌平、武清、三河的游民，在香河组织所谓维持会。于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内蒙自治政府”“冀察政务委员

会”等等，也就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使冀察两省又成了变相的“满洲国”。中华民族真正到了危险的时候。针对着这样一个危急的局势，党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在这亡国灭种的关头，无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都应当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不久，党中央红军主力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到达中国西北地区，与甘陕红军会师，积极准备反击日本的侵略，这是中国在危急关头出现的希望的曙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1935年10月，北京学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成立了北京学生联合会，发起组织大规模的请愿，反对华北伪自治运动。接着在12月9日，北京的五六千名学生又举行了伟大的爱国请愿运动。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且提出了抗日的基本条件，很快，这个运动得到全国学生的响应，扩大到了全国。其他的爱国人士也纷纷起来，组织各界的救国会，展开全国性

的抗日救国运动。上海也成了这个运动的一个中心。在上海的艾黎也受到极大的鼓舞。抗日是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所展开的斗争,也是世界被压迫的民族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和压迫而展开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艾黎充分理解。

这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远东支部的书记、美国籍的格兰尼齐,和他的爱人来到了上海。艾黎积极帮助他创办一个英文刊物《中国呼声》。这是在中国出版的对外介绍中国人民革命运动情况的第一个外文刊物。通过这个媒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侵略斗争,更紧密、更亲切地互相呼应。艾黎以种种的化名,为这个刊物写了不少的文章,介绍中国红军的英勇事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情况。他自己还是一个诗人。他也没有忽略当时正在与蒋介石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浴血斗争的进步文化界。作为反文化“围剿”的主帅的鲁迅的作品,通过他的努力,也第一次大量地在这个刊物上被介绍给世界的人民。

艾黎这时已经能相当流利地阅读中文书报和用中文进行会话。他还经常挤出时间翻译有关中国红军战绩和中国革命运动的一些文件,供给在上海的外国进步人士参考——特别是美国的女作家史沫特莱。她当时正在上海写一本有关中国革命的书——这也是外国朋友最早写的较有系统地介绍中国革命情况的书。他还当口译。有的外国进步人士要访问上海中国党的地下工作者或红军的代表,他也经常出席。他不仅是联系人,同时也充当翻译。

当然,要扩大对外有关中国革命斗争情况的宣传,最好能有外国的开明人士——特别是记者——亲自到中国解放区去看看,在

那里收集第一手的资料,把实情告诉给世界人民。有一天艾黎就接到这样一个通知:解放区欢迎这样的人去参观,也非常欢迎有专门技术的外国专家到解放区去工作。这时,艾黎脑海里便浮现出了两个熟识的人影,他对这两个人有一定的了解,也知道他们会愿意前去解放区的。这两个人都是来自美国,一个叫爱德迦·斯诺,另一个是马海德。斯诺是一个年轻的新闻记者,很愿意了解中国解放区的情况,同时也颇有吃苦耐劳的本领。至于马海德,他是一个在日内瓦和贝鲁特受过专门训练的医生,他在上海开业。作为上海“马列主义小组”的一个成员,他一直想做一点实际的革命工作,寻找机会去解放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他的技术。这两个人一说就同意了。剩下的问题是怎样安排他们到陕北解放区去的路程。

当时去陕北解放区的旅途非常困难。延安那时还是在东北军手里,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所在地是保安,要到达这个地方得冲破国民党政府在沿途以及周围所设的种种封锁。而从上海走那么远的路途,通过一道道的关卡,更是不容易,特别对两个外国人。他们跋山涉水,到那个“土匪盘踞”的中心去干什么呢?这不光是国民党政府不容许,美国政府也同样反对。所以这两个美国人得秘密前往,而且还不能同行。马海德打前站。果然不错,困难超过了他们的预料,他还没有到达陕北的边界就得折回上海。但这也给他们提供了经验。第二次马海德径直前往平凉,从那里转西华池,绕道到了保安。在这个经验的基础上,斯诺算没有走太大的弯路。他从山西经风陵渡,辗转来到瓦窑堡,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保安。

斯诺是去陕北解放区的第一个外国记者。他没有白费此行。他向世界人民揭示了

一个新的世界,那就是他后来所发表的一部著作《西行漫记》。

在这差不多前后,艾黎还送了另一个外国人前往西安。这就是奥国医生温启博士。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平时一贯沉默寡言,不修边幅,衣着也很朴素,皮鞋上经常还有几块补丁,看上去他是一个“只专不红”的、学究式的人物。但他却怀着一颗对革命火热的心,他放弃了他在上海的开业,而在西安七贤庄开一个简单的诊所。这本来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业”,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平常的诊所却起了不平凡的作用——它成为向陕甘宁边区红军输送医药的一个据点,而当时红军又是多么需要医药!艾黎在上海等大城市弄得来的医药,就是通过各种渠道运往西安,再由他转运。他做这件不平凡的工作,一直到他结束了平凡的一生,这也就是说一直到西安事变的那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在混乱中把他刺杀死时为止。后来八路军在西安办事处的地址,就是他生前工作过的那个平凡的诊所。

六

形势在发生更复杂的变化。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愈紧,中国人民的反抗也就愈烈。他们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掉转枪口一致对外,立刻展开全面抗战。红军也已经组织了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占领同蒲路,准备开赴冀察前线,为全国的抗日人民打先锋,蒋介石害怕人民更甚于日本军国主义。这种汹涌澎湃的抗日浪潮,使他吓破了胆。在1936年的下半年,他把日本节节进逼的紧急情势置之脑后,而威逼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剿共”计划。他的目标是陕北中国工农红军驻地。他准备前往西安,拟把那里驻防的张学良和杨虎成的部队推到反共内战的前线。

这是一个极端可怕的阴谋,中国的情势不允许有这样大规模的内战。革命工作者必须

尽一切力量,在有关的人员中间展开大量的工作,使这个阴谋不能得逞;而与这直接有关的人员,在当时的情况下则大部分是东北军的将领和士兵。有必要帮助他们认清形势,认识蒋介石的阴谋,唤起他们的爱国心,使他们不致于受欺骗,不对自己的同胞发射半颗子弹。这是一种复杂细致的工作,它需要极大的毅力,讲究策略和机警,同时也需要有经济的支援。而时间又是那么紧!哪里能得到经济支援呢?就在这万难的时刻,艾黎接到一份从西安发来的电报,要求他立即离开上海,作一次紧急的旅行。

他来到西安。有好几箱子的旧钞票在等待着他。这是山西临近陕北几个县份所发行的地方钞票——也是山西地方小军阀和土豪劣绅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敲诈勒索得来的赃物。原来,当革命势力伸展到这片地区的时候,尽管他们对强大的红军做过一番困兽犹斗,他们最终还是招架不住,只好弃甲曳兵而逃,把这些赃物扔在后面。对红军说来,它们谈不上是什么“战利品”,因为它们无法兑现,也没有什么别的用处,全是废物——有的还穿了孔,沾染了血渍。

但废物是不是可以利用呢?——不,这还不是一个利用的问题,而是要“化腐朽为神奇”,使它们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为革命出一点力。现在艾黎被调来,就是希望他来 completion 这项“化腐朽为神奇”的工作。他接受了这个任务。

他同时带来的还有两个“旅伴”:一个是上海外国人开的协士德工程学院的教员、英国人胡贝乐特。这是一个矮个子英国人,脑子里面装的是一大堆科学道理,头上戴的是一连串“荣誉”博士的头衔——这是许多科学机构赠给他的“荣誉”。但他和一般埋头于科学工作的人不同,却非常重视感情。他认为艾黎是一个正直人,一个从不坑人的朋友,因而很重视

他对自己的友情。他同时还认为艾黎做的事也都很正直,因此艾黎求他帮忙,只要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总是乐意助一臂之力。另一位“旅伴”则是上海外国人开的麦伦中学的学生——一个中国人,一个搞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但外表倒颇像一位“少爷”。他的特点是力气大,百十来斤重的东西,提在他手里,虽然不能说是轻如鸿毛,但决不致于妨害他走路轻快的步子。他们结成为一队半旅游、半办公事的“外宾”,那个中学生则是他们所雇佣的“秘书”和“翻译”。这两个洋人,一个的身份是“英美烟草公司”的“经理”,另一位则是“华洋义赈会”的视察专员。他们这次是去山西军阀阎锡山所盘踞的太原。在那他们除了办有关业务的“公事”外,还要“游览”太原的名胜——双塔寺。

当然,“公事”重要,他们得先办完,然后才能有心情去“游览”名胜。他们拜访了太原的每一个钱庄。他们的名片上所显示出来的身份,在那些钱庄老板的心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个是满腹经纶的“博士”,一个则似是腰缠万贯的“大亨”。作为欧美来的“外宾”,他们当然受到“热情”的接待。他们没有花费太大的周折,就把这几箱山西地方钞全换成了“中央法币”。这件“公事”办完后,说来也奇怪,他们并不感到心情松快,相反,他们感到时间非常紧迫,好像一件危险的事情随时就可以发生。他们把每分钟当做一个钟头来使用,以飞快的速度把这些“法币”电汇到上海。于是他们便三步并作两步,以同样飞快的速度赶到火车站。他们跳上一列正要开行的火车,离开阎锡山的巢穴太原。这时他们心里才算落下一块石头,安全地回返上海。至于“游览”双塔寺的计划,那只有留待以后再说了。汇款已经先于他们而到了上海。艾黎立刻又把这笔款子用电汇转到西安——数目相当可观!

这是1936年9月末的事,离即将发生的“西安事变”只不过两个月的时间。

七

“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亡国的反共内战,并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日本军国主义害怕中国出现团结的局面。“西安事变”只不过刚过半年,它就在卢沟桥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一个月以后它又进攻上海。这是它全面进攻华北和内地的序幕。事实上它是企图在短期内征服全中国。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立即展开了全面的抗战。面临着这个新的形势,自己能做些什么呢?这是艾黎对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那时斯诺正在上海,他向斯诺征求意见。

“中国现在需要工业来支援抗战,”斯诺说,“为什么不在全国搞些工业——合作社式的工业——呢?……中国人是干合作社的能手呀……你还呆在上海干什么呢?”

斯诺的话有道理。要长期抗战下去——而这场战争也将是长期的,没有工业的支援是不行的。中国一点脆弱的工业位置都在沿海城市,现在已经全部落进日本人的手中。内地城市的一些工业也在随着日军的推进而沦陷,没有沦陷的也遭到日本飞机不断的轰炸而瘫痪。中国的对外通道,也已经绝大部分被封锁。要把抗战坚持下去,还得想些自力更生的办法。此外,蒋介石虽然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但是他的本性并不就此能够改变。他是一个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事事都依赖外国洋主子。外援一截断,他很快就会动摇,只要日本军国主义再进一步对他施加压力,他就会投降。这个问题一明确,于是艾黎就决心办起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来。

他有这样的想法:工合对持久抗战可以起它特殊的积极作用,它可以直接支援前方士

兵,供应他们生活上所必需的东西,如军毯、军服、牙膏、牙刷等;它可以稳定后方经济,给人们提供必要的消费物资;它可以解决难民问题,给他们造成就业机会,引向“生产自救”的道路;待它发展到了有一定基础的时候,它还可以给前方供应弹药和一定数量的小型武器,修配枪支和大炮;从长远看,他还可以培养一批技术人员,为将来抗战胜利后,建设新中国准备一批技术力量。这一切将以合作社的方式进行,根绝过去人剥削人的种种做法。这本身也是一件新兴事物!

艾黎将他的这些想法就商于一些中国同志,立即得到了支持和鼓励,提高了他的信心,也更增加了他的勇气。但资金从哪里来呢?如何把这个计划在全中国推广开来而不致于受到蒋介石的阻挠呢?一只有在全国铺展开来,工合才能起到它应起的作用;也只有这样,它才能在解放区发展,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游击队抗战,而不致引起蒋介石的公开捣乱。因此这必须成为一个运动,像毛泽东主席所指示的那样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一部分——不仅是国内的统一战线,甚至还成为国际的统一战线的一部分,以便动员国内外进步人士募捐,支援中国抗战。

主张既定,艾黎于是便开始工作了。他推动像斯诺这样已经颇有国际声望的新闻记者及中外的知名人士,展开有关工合运动的宣传。有些赞助中国抗战的外国热心人士,包括斯诺本人,还特地到美国各地演讲或在美国政界人士中间做工作,宣传中国工合运动对抗战的意义。英、美那时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英、美政府也希望中国能够坚持抗战,顶住日本,以便他们能腾出手来应付欧洲已经开始在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工合运动不仅在英、美进步人士中得到支援,甚至在英、美政界中也引起反

响,在许多方面给予一定的方便。于是在香港便成立了一个许多外国名流参加的、以宋庆龄女士为名誉主席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艾黎本人则成了国际委员会的委员和实地工作秘书。

在这种国际声援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着了慌。它也得表态。表什么态呢?首先它得表示它要抗战下去,不想投降——这也正是工合所期望达到的目的之一。既不想投降,就得支持工合。它忍痛赠予艾黎一个“国民政府行政院总技术顾问”的名义,宋子文还拨出一笔款项作为工合的基金——不是捐赠,而是借与,后来工合都一文不差地还清,还按照当时的借款利率加了利息。艾黎因此便也取得了合法的身份,可以放手展开工作。

这样,工业合作社便如雨后春笋似地在全国发展起来。艾黎通过它建立了三条经济战线:一条是接近前方战线和游击队的活动地区;一条是在大后方,可以建立带有长期性的工厂和作坊;一条是在比较更安全,但是可能遭到日机轰炸的地带——这里工合将为上述两个地区的工合提供机器设备和零件补充以及必需的技术人员。这些工合组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法满足人民消费品及兵士的基本需要,同时还可以防止汉奸和走私贩子从日寇控制的沿海地区和日本本地偷运私货进入后方和把后方的原料盗卖给日本。大批的难民和伤兵也可以通过工合取得谋生的手段,而不致于流离失所。

在短短的两年期间,从四川的松潘直到山东的游击区,工合共建立了3600多个大小不同的工厂和作坊,安置了30多万工人,向前线的临时工厂输送了4万多名技工。在推进这些工作的过程中,艾黎用自己的双腿和自行车跑遍了16个省份——当然也包括陕甘宁边区,走过了3万多公里的高山、峡谷、河川和平

原。这些工合的工厂和作坊生产出500多种、50多类的产品,其中包括帐篷、担架、医药、手榴弹和军毯,直接支援抗战。当时华北太行山地区,以及叶挺将军部队的前方和后方,便成为了工合产品供应的重点。

当然,艾黎也不是一头栽进工合运动中去,别的什么事情都不管。曾经在上海编辑过《中国呼声》的格兰尼齐这时正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宣传中国抗战。刚从西班牙战场上回来的白求恩大夫遇见了他,便表示想来中国参战。格兰尼齐把他介绍给艾黎。艾黎便安排他和八路军接上关系,安全地到达延安。另外,还有一批友好的印度医护人员也组织了一个援华医疗队,其中包括巴苏和柯棣华,要来中国支援抗战。但他们并不知道,国民党政府虽然自称“代表中国政府”,但实际上并不抗战。幸好他们一到香港艾黎就和他们接上了头。艾黎告诉他们,要支援中国抗战,他们就必须去解放区、去延安。他们来重庆后,艾黎为了保证他们能对中国抗战发挥作用,特地设法亲自护送他们前往延安。

在此同时,工合在发展。有些工合工厂由于生产技术的逐渐提高和熟练工人的数量逐渐增多,还可以制造出较重型的机器和部件。1941年,艾黎接到一项任务:为战斗在晋西北的贺龙将军建立一个铸铁翻砂厂,制造大批手榴弹。艾黎感到兴奋的不得了。他夜以继日画蓝图、做计划,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任务。他带着有关的蓝图和资料前往解放区。到洛阳歇脚的时候,他没有料到这里的工合办事处出了叛徒。叛徒请他吃饭、洗澡。就在他洗澡的时候,叛徒盗走了他衣袋里有关铸铁厂的资料,向国民党政府告了密。幸好他发觉得早,也离开得快,国民党政府没有来得及把他投进监牢。

但国民党反动政府撤销了他“行政院技术

总顾问”的职务,对他下了通缉令,要把他驱逐出境。艾黎感到说不出的苦恼。这时,像他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刻一样,周恩来给予了他勇气和鼓励:国民党政府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中国人民需要他在中国继续工作。他还持有“工合国际委员会委员”和“实地工作秘书”的头衔,蒋介石无权剥夺它,也不敢剥夺它,这给艾黎继续做他的革命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虽然国统区的工合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摧残,但艾黎并不气馁;相反,他反而更信心百倍地推动解放区的工合继续向前发展。此外他还创办了一个培养较高级技术人员的学校——山丹培黎工艺学校。

这个学校是以一个他所崇敬的美国朋友贝利的名字命名的。这个人,前面已经提到过,在19世纪末就来到中国。他热爱中国,他认为中国的贫弱是由于中国没有科学,他办过不少的“技校”,培养出不少的科技人员,但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他所培养的科技人员都没能发挥作用。到了暮年,他两袖清风,在他回返美国的途中,他发现他得了前列腺癌症,而且到了晚期。他知道他不能再继续工作,于是便开枪自杀了。艾黎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学校,这里还有另外更深一层的意义:培黎在中文中原名贝利。他把“贝”字改成为“培”,把“利”字改为“黎”,成为“培黎”,象征着这所学校创办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黎明的人。他已经意识到中国的黑暗时期将会过去,黎明不久就要到来。这个学校的学生都来自贫苦劳动人民的家庭,他们在这个学校学习的年限特长,为的是等待解放到来。艾黎接受了贝利的教训,他不能让他的学生在一个腐败的政治制度下变成无用的人。

建国后,艾黎就把培黎学校完整地交给了人民政府,它的毕业生随着解放军分散到各个地方。他们现在个个都成为了工业建设的骨

干,散布在全国各个石油工业基地,包括玉门油田、大庆和海洋等油气田。培黎学校也一直在继续培养技术干部,艾黎作为学校的名誉校长,一直保留这个名义到1974年。

八

新的形势带来了新的任务。中国虽然已经解放,但美国仍然在支持蒋介石霸占着台湾,接着又大举入侵朝鲜,有掀起另一场世界大战的危险。艾黎马上又投入新的战斗。他奔走世界各地,在和平讲坛上控拆美国的侵略,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保卫新中国。他还用他的笔,大量写作歌颂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章和诗。他还翻译了不少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和当代作品,向世界人民介绍,以加深世界人民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到1977年年底为止,他在外国和中国一共出版了17部诗作,8部翻译的中国诗集和30部介绍中国情况的书籍。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

建国前和建国后,艾黎在中国所生活和工作过的岁月,现在加起来,一共有半个世纪加一年。就在1977年12月2日,邓小平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庆祝艾黎80寿辰的时候,在庆祝会上曾说过这样一段有关他的话:

“…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50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

艾黎本人在庆祝会上也做了这样的表白:

“……中国革命给我很大的教益。对此我个人是十分感激的。我非常钦佩所有那些过去战斗得十分出色、现在又努力把革命推向更

高阶段的人们。……最使我高兴的是,在中国度过的这年月里,我能够同普通的劳动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跟他们共同生活,一起战斗。这为我打开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我想最后这句话也包含这样一个意思:在和中国人民一起斗争实践了半个世纪以后,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978年春节

(本文原载《人民文学》1978年05期)



(作者简介:叶君健(1914—1999),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作家。生前曾任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大学教授,英、法文《中国文学》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笔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世界文化理事会的达芬奇文学、艺术奖评委。著有《叶君健小说选》,长篇《土地》、《寂静的群山》,中篇《开垦者的命运》,散文《两京散记》,翻译《安徒生童话全集》等。他所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获得国内外学者、专家的极高评价。)

黄华回忆接待斯诺第三次访问新中国

编者按:《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8月版)是由我国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黄华撰写的个人传记。作者从延安时期即开始外交工作,与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友情甚笃。这是他回忆接待斯诺第三次访问新中国的历史情景。



一九七〇年八月下旬,黄华陪伴埃德加·斯诺重访保安,在毛泽东旧居前留影

1970年6月,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埃德加·斯诺夫妇访华。周总理通知调我回北京参加接待工作,我是第一个从干校调回北京的干部。我们班里的同志为我饯行。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于1960年和1964年两度访华。1960年的那一次,我正要去加纳任大使,同斯诺的一些老朋友到机场去接他,但没有时间同他多接触。1964年,我在非洲,更没有机会同他见面。现在好了,我可以好好地陪陪我这位有近四十年交情的老友。当然,这还不是我个人感情的事。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毛主席、周总理这些中国领导人的老朋友。他的每一次访华,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1960年他来中国,花了五个月的时间访问了十四个省,十六个主要城市,寻访他旧时留下的足迹,观察新中国发生的变化,写出了他的第一本介绍新中国的书《大河彼岸》。在他这次访华期间,毛主席、周总理分别同他长谈了两次。毛主席同他推心置腹地长谈,还说想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和波多马克河游泳。周总理对他谈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情况,解释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原则,实际上提出了十年后他同尼克松总统谈判中美关系的框架。1964年斯诺到中国的前几天,苏联的赫鲁晓夫下台,第二天,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周总理在斯诺抵达北京后很快见了,给他看中国原子弹爆炸的十二幅照片。斯诺说他可以立即回日内瓦,在瑞士报纸上发表这些照片。斯诺高兴地开玩笑说,你们真是拿了一手好牌,一个K(指当时阿富汗国王来访),两个Q(指来访的阿富汗王后和布隆迪王后),一个J(指来华访问的怡和洋行董事长凯瑟克),现在又打出一张A(原子弹)。之后,他把这些照片在瑞士报纸上发表了,立即轰动了全世界。

1970年8月,斯诺要作为第一个西方记者

来看文革中的中国。他对中国怀着深厚的友情,一直关心中国发生的一切。西方传媒关于中国文革的报道使他迷惑、忧虑,他想亲自到中国来看一看。他写信给在中国的老朋友,甚至写信给毛主席,询问访华的可能性。

当时外交部有个高官,不想让他来。但毛主席认为应当请他来,不仅让他来看看,还有些想法要让他传播出去。于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受命把斯诺从瑞士请到了巴黎,同他谈了访华的事,问题迎刃而解,斯诺夫人洛伊斯也被邀同行。1970年7月31日,斯诺夫妇从瑞士乘飞机到香港。斯诺这时的身体太虚,又有高烧,一直休养到8月14日才坐火车抵广州,再换飞机到北京。《华盛顿邮报》的观察家说,斯诺的这次访华是中国人有兴趣发展与美国关系的信号;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也发电至华盛顿说,这次访华有利于创造中美关系的奇迹。

我和何理良到北京机场迎接斯诺夫妇。去接他们的还有斯诺的老朋友路易·艾黎和马海德大夫等人。斯诺一下飞机,就同我热烈拥抱,我们正好有十年没见面了。

回到中国访问使斯诺兴奋不已。他对看见的一切都感到亲切和新鲜,连机场路两旁的整齐的杨树也令他赞叹不已。斯诺告诉我,他和现在的夫人洛伊斯结婚也有二十年了。说她原来是纽约市的一位话剧演员,对中国的舞台艺术很感兴趣,早想来中国,但是以前一直没有机会。还说,他们有两个孩子,男的叫克里斯多弗,女的叫西安,现在都在瑞士。斯诺性子很急,也很坦率,一开口就要我们这些老朋友向他介绍最近五年中国的情况,并说说这次邀请他访华的原因。这两个问题,他后来都得到了权威的和有说服力的解答。

两天以后,斯诺夫妇在颐和园同朋友吃晚饭,突然接到周总理的邀请,去观看一场中国

乒乓球队与朝鲜队的表演赛,并同他交谈。周总理在落成不久的首都体育馆会见斯诺,自然给在场的各国外交官留下非同一般的印象。总理先同斯诺谈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关心的“防骄破满”问题,未点名地批评了林彪。从表情上来看,斯诺一点都不明白“防骄破满”的含意。总理还建议他先到外地参观或去北戴河休养一段时间。斯诺急着要去采访毛泽东、周恩来和了解中国情况,哪里舍得花时间去休养,他婉谢了总理的好意,同意先去各地参观访问。会见中,总理对美国情况问得很仔细,斯诺则询问中美关系是否有机会创造新的开始,总理说邀请他访华就是希望对此问题找到一个答案。

当时总理劝斯诺先去参观或去北戴河休养的提议背后确有重要原因。那时林彪野心膨胀,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三番五次提出要修改宪法和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其实是想自己取代并当国家主席。他的主张几次被毛主席否定,但他仍坚持己见。周总理这时的的工作非常繁忙,因8月下旬即要召开十分重要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的议题之一是修改宪法,即是否要设国家主席问题,而当时有不少人在跟着林彪摇旗呐喊,因此有许多说服工作要做;第二个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方案问题,这事也因“四人帮”蓄意阻挠,要通过并不容易;其他议题是毛主席极关心的备战问题,需要大量投入,如何解决等。由于这些问题都很棘手,毛主席和周总理尚无暇顾及斯诺的采访问题。

根据总理的指示,从8月下旬起,我和何理良及外交部的两位英文翻译徐尔维和姚伟同志,陪同斯诺夫妇在北京和外地参观。我们参观了清华和北大,包括斯诺三十年代任教燕京大学新闻系时的燕园。在林巧稚大夫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反帝医院(即协和医

院)。然后参观有光荣革命历史的二七机车厂等地。接着飞西安,去访问延安和保安。1936年斯诺和马海德骑着牲口到保安去的那条峡谷小路,现在是宽阔的黄土公路了。我们的汽车快到保安时,路旁突然钻出许多欢笑的孩子,向我们欢呼。斯诺像回到故乡一样,充满怀旧的深情。他寻找毛主席当年住过的窑洞、红军大学旧址和他当年住过的招待所,还同我在毛主席旧居前照了张相。斯诺夫人告诉斯诺,她看见许多人穿着旧的、打补丁的衣服。斯诺说,当年这里的老百姓一人只有一条裤子和一件上衣,上衣在夜里还要当被子盖。还说:1936年这里只住着一百人,现在有三千人;过去这里完全没有工业,只有一家小铺子,红军是在小祠堂里开群众大会的,现在这里有十三个手工工厂、一个机修厂、一个发电厂,主要街道两旁全是小商店,还有一家小百货公司、一个有一千个座位的戏院。老百姓的住房、穿着和饮食虽然很简单,同过去那种赤贫的状况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保安的领导人在新建的政府办公楼热烈欢迎我们,欢迎宴会则在露天举行。干部和农民同我们一起吃新鲜的玉米、烤红薯、陕西式的大米捞饭、辣子鸡和红烧猪肉。老区的干部和群众对斯诺这位美国老朋友是有真情的。

我们回到北京,很快又乘飞机去沈阳和鞍山参观,到广州参加广交会,到杭州、上海、南京和武汉访问。斯诺对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武汉长江大桥和从电影上看到的成昆铁路的建成赞赏有加,他没有想到在完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中国完成了这些伟大的工程。他的身体并不好,却坚持一步步走完两公里长的长江大桥。在上海,出面接待他的是徐景贤,他叙述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发动的经过,介绍了造反派夺权的安亭事件。斯诺对徐景

贤说,没有老干部就没有你们今天。这时他忽然站起来说,你们要老革命触及灵魂,可他们的灵魂是干净的。讲完就告辞,弄得徐景贤很尴尬。自1936年就打从心眼里敬佩红军的斯诺生气了。我还从来没见过斯诺这样生气。

再次回到北京后,10月1日,我陪斯诺夫妇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游行。毛主席在城楼上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各国驻华使节握手致意后,请周总理来邀斯诺夫妇去主席那里,主席同斯诺作了一些交谈,他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中间,大约有四十分钟。事后毛主席说,这是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斯诺是个十分认真和勤奋的记者,看实地调查,爱同各种人接触交谈,喜欢一个人到街上走走,用他那半通不通的普通话同人聊天。有一天晚上,他走出北京饭店到后面的小街散步,看见一些人在排队买烤白薯,那是他最喜欢吃的,于是也排在人群中。轮到他买的时候,老头儿向他要粮票,他才明白在中国那时买粮食包括买白薯不仅要付钱,还要付粮票!他赶忙回饭店向我要了粮票,才吃上了那香甜的烤白薯。

12月7日,周总理给我写了封信,要我向他报告斯诺夫妇访问了什么地方、工厂、学校,接触了什么人,还有多长时间留在北京,以便主席考虑何时见斯诺并同他谈些什么问题。总理提醒我,在我的报告中不要建议林彪、江青见斯诺;更不要提请总理见斯诺。总理要我报告斯诺的访华情况,是理所当然;对我的那些提醒,倒出乎我的意料。实际情况是,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后,尤其是以林彪和江青为首的两个反革命集团又勾结又争夺最高领导权力的图谋已有明显表露,对此周总理和许多老革命同志看得十分清楚。1970年8月、9月间在庐山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

上,林彪发言又提出设国家主席的主张,陈伯达鼓吹天才论,篡权意图被毛主席迅速识破,他指示收回林彪的发言文件,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陈伯达,并对之发起了批陈整风运动。

斯诺在中国访问已经四个月了,安排他采访毛主席的事不能再拖了。周总理知道斯诺的报道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而不能让斯诺被林、江利用,但其深层原因又不好对我明说,因此只好在12月7日夜里写了一封短信提醒我。至于他本人,虽然斯诺几次要求采访,可是他从来是克己奉公,严于律己,那时更不能招致非议,嘱咐我不要提到他。

斯诺对中国最后的报道

1970年12月18日晚,毛主席请斯诺去中南海谈话和吃早饭,由王海容和唐闻生二人参加担任记录和翻译,一直谈到中午。首先他说,外交部有人反对你来,说你是美国特务,此人就是乔老爷(乔冠华)。然后他谈到文化大革命,文革中的讲假话和武斗,也谈到个人崇拜。他问斯诺,如果没有人崇拜,你会高兴吗?当斯诺谈到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败的时候,毛主席未作出反应。关于中美关系,毛主席表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就得同他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见,但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我负责初审斯诺关于主席这次谈话的“纪要”,以便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全党和全国各基层单位。

12月25日毛主席77岁诞辰前夕,《人民日报》在头版通栏位置报道了毛主席12月18

日会见斯诺“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的消息,并且刊出10月1日毛主席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时的合影照片,再一次用含蓄的方式向美国发出信息。尼克松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他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在斯诺这次访华期间,周总理曾几次同他谈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国内形势,在毛主席12月会见斯诺之后,总理还同斯诺长谈了一次国内经济情况,给他提供了1960—1970年我国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数字。

为了在圣诞节时同儿女们团聚,洛伊斯·斯诺决定先离华回国,斯诺则留在中国等待毛主席审定谈话稿。这时,天气寒冷,斯诺还只穿一件毛衣和单裤,又是细致周到的周总理建议给斯诺做一件呢子大衣和买一件丝棉袄,以我的名义送给他。我们知道斯诺手头并不宽裕,原先要全程免费招待斯诺夫妇,但斯诺为了避免国外有人说斯诺受中共贿赂,在离京回瑞士前,硬是把几个月的旅馆房费交给了北京饭店。

1971年2月,斯诺结束这次长达半年的对中国的访问,回到瑞士。他的访华报道,最重要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同他的谈话,先后在意大利的《时代》杂志、美国的《生活》杂志等报刊上发表。《生活》杂志的文章和毛主席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已放在尼克松办公室的案头。4月间,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访问中国。

斯诺对7月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中美发表公告,尼克松总统要访问中国等这些消息感到十分兴奋。他在瑞士家中,忙着撰写他这次访华的新书《漫长的革命》,准备在次年尼克松访华前先抵达北京,采访这一震撼世界的大事。但这时斯诺的身体很不好,经常感

到疲倦。后来经过医院检查,发现他的肝肿大,得了胰腺癌,斯诺住进了医院。在医院他接到一封来自尼克松的信,问候斯诺的健康,对斯诺“长期杰出的生涯”表示敬佩,还说他访问中国,如果斯诺能先期作为他的访华特使,他将感到极大的荣幸。斯诺认为,尼克松的信是一杯苦酒,美国同新中国的关系早就该建立了。他没有回复尼克松的信。

斯诺夫人为丈夫的病写信求援,写给在美国和英国的亲友,也给在中国的马海德写了一封。马海德复信给她,请斯诺考虑到北京接受治疗。她还收到周恩来总理的信,其中附有毛主席和邓颖超的问候,不久又收到宋庆龄的信。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北京日坛医院为斯诺准备好了病房,布置得很有家庭气氛,等候斯诺一家人的到来。我们还包租了法航班机的一等舱,供斯诺一家乘坐。去瑞士迎接斯诺的六人医疗小组,由马海德率领,于1972年1月抵达日内瓦,立即由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陪同他们去斯诺家。医疗小组为斯诺作了检查,认为他的胰腺癌在手术后有广泛转移,肝功能衰竭,只好改变计划,把病房设在斯诺家中,就地治疗。

2月初,我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正在亚的斯亚贝巴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接到北京的特急电报,说斯诺病危,周总理要我赶往瑞士去看望斯诺,代毛主席和周总理本人向斯诺问候。我赶到斯诺家,他刚从前几天的昏迷中清醒过来,马海德对他说:“你看谁来了?是黄华!”斯诺立即睁大眼睛,脸上出现极兴奋的笑容。他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抓住我和马海德的手,用尽全身的气力说:“啊!咱们三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1936年,我们三人一起在保安时,斯诺常把反动派咒骂红军为“赤匪”当作笑料。现在听他这样说,我既感动,又心酸!我在斯诺家看望

他两天,同斯诺的儿女谈了很久。我讲述他们的父亲如何同情中国人民在旧社会遭受的苦难,如何不畏艰险去偏远的中国西北,探访和了解中国的革命道路,向全世界传播了中国的革命伟业。我问斯诺的女儿,知不知道她为什么叫西安。她回答,“中国有座古城叫西安,爸爸年轻时就是从那里出发去寻找毛泽东,寻找东方的魅力的。”儿子克里斯多弗说,“妹妹的名字多好,那么我的名字就叫延安吧!爸爸也去过延安。”

1972年2月15日,尼克松访华的前六天,

中国的春节,斯诺辞世。

斯诺在遗言中写道:“我热爱中国,希望死后我的一部分仍像生前一样能留在中国。美国抚育我成长,希望死后我也有一部分安置在哈德逊河畔。”

1973年5月,北京大学举行了非常正式的斯诺骨灰安放仪式,洛伊斯·斯诺带着女儿和妹妹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大理石墓碑上的碑文是叶剑英元帅书写的。一年后,斯诺的另一部分骨灰埋葬在纽约市哈德逊河东岸的林间空地。

《卢广绵与西北工合》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

《卢广绵与西北工合》2022年8月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该社的前身是1936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华文化书局,是一家历史悠久的综合性文化出版机构,主要出版文化、艺术、教育、科技、文史、卫生、经济管理类别图书及各领域学术专著。

卢广绵(1906-1995)。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时期受“五、四”运动影响参加爱国运动;1929年赴英国留学,攻读政治社会经济,“九、一八”事变发生,他终止学业回国与阎宝航、高崇民、江问渔诸先生一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参加组织农村工业改进会(后为华北棉产改进社)担任总干事,在河北深泽东鹿创办第一个棉农运销合作社,开办合作讲习班、《农友》周刊,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等,在河北南部二十多个县组织起数百个棉花运销合作社与联合社,农民群众爱称他“卢管棉”。

“七七事变”后南下上海,加入刘湛恩、胡愈之主持的救国团体“星一聚餐会”,并在该会中参与创办“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中国工合运动”),此后成为第一个工合社的创立者,西北工合的开拓者领导者直到抗战胜利。

1946至1949年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瑞士日内瓦国际难民救济委员会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辞职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任职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是第六和第七届全

国政协委员。1983年中国工合协会和1987年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恢复后曾任副理事长、代理理事长和副主席。

“中国工合运动”(更简称“工合”)是1938年4月在沦陷后的上海,中国沿海沿江工业生产大部被日寇摧毁占领,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由国际友人斯诺夫妇和艾黎创意,胡愈之、徐新六、卢广绵、梁士纯等爱国人士参加发起,得到国共两党、国内各界与国际社会普遍支持的运动。目的是要在后方及战区游击区迅速组织流亡工人难民技术人员和当地民众,建立小型分散的以手工与半机器生产的各类合作社,就地取材生产军需民用物品,支援抗战,稳定后方。1938年8月在汉口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后迁到重庆)1939年7月在香港成立“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后迁到成都)。工合用极为有限的资金,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陕甘晋豫鄂绥(西北区),川康湘桂黔(西南区)赣粤闽浙皖(东南区)与云南等十七个省份的九十多个市县建立了事务所和近千个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二十多万人参加生产了大量军需民用物资,在延安、陕甘宁晋东南皖南解放区工业合作社也都有相当发展。在香港、菲律宾、纽约、檀香山、伦敦、印尼爪哇、马来亚、泰国等地都先后成立工合推进委员会,为工合筹集资金、设备和技术支持。

(下转23页)

功绩卓著的工合战士普艾达

吕宛如



1985年8月下旬,从太平洋彼岸传来了中国的老朋友艾达·普律特(普艾达)逝世的消息,在北京医院病榻上的路易·艾黎曾为痛失又一位同代知交,思绪万千,专门写过一篇记述他同普艾达从相识到共同为工合工作的经历以及艾达同中国深切关系的纪念文章,使不少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和她劳苦功高的生平事迹。普艾达被艾黎誉为“三位伟大美国女性之一”的著名社会工作者,的确不像她的同胞S(史沫特莱、斯诺和斯特朗)那样为中国人民所熟悉,但她在沟通中美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推动工合运动,支援中国人民抗战方面的卓著功绩却同样是不能磨灭的。

普艾达96年的一生跨越了19和20两个世纪,成长于中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有着极丰富多彩的经历。她的父母是美国南部浸礼教会的传

教士,他们于1888年来到山东黄县,在一个叫孙家滩的小乡村落户,开始传教和兴办学校等社会福利事业。当年12月23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艾达出世。由于黄县没有医生,母亲只得到蓬莱县的一所医院分娩。一个月的艾达回到黄县,便生活在典型的中国农村环境之中。她的保姆“大大”成了她幼年不可缺少的人物。她穿中国式的斜襟旗袍,学会一口山东土话,和中国孩子一起玩耍。整整12年的黄县生活,给艾达的思想、习惯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

1900年艾达回美国上学,1918—1919年开始在费城慈善机构工作。1920年她被洛克菲勒基金会选聘为北京协和医院建立医学社会服务部、并主持这一工作。直至1938年,她培养了中国第一代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受到她的学生们深深的爱戴。她在北京的家门几乎向所有愿意同她交往或求助于她的人随时敞开着。抗战爆发后,她的家很快成了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掩护所。她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热爱和信念,使她加入了支持共产党人为反抗日本侵略和西方经济控制而斗争的行列。

1938年艾达同北京协和医院签订的工作合同期满,经埃德加·斯诺介绍,去找路易·艾黎,在中国内地帮助组织工业合作社,为抗战做些实事。艾达欣然同意。当时艾达并不认识艾黎,也不知道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听说艾黎正在东南地区,她便到浙江金华的一位美国朋友戴维斯家去打听艾黎的下落。恰巧艾黎这时从赣州的工合东南地区总部来金

华筹组工合办事机构,艾黎对工合发展前景及其作用的描述吸引了艾达,他的决心、魅力和实干精神更使艾达折服。艾达决定参加工合工作。她先到上海组织声援,旋即去香港活动,积极努力把各国的工合支持者联系在一起,成立了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的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她作为秘书到处奔走呼吁,为工合筹集资金和物资等各种援助,为了开展美国的支援工作,艾达用自己仅有的积蓄当作回美旅费,并在纽约建立了美国援助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成功地争取到像伊琳娜·罗斯福夫人(当名誉主席)、哈里·亚纳尔海军上将(当主席)和鲁(卢)斯出版系统的亨利·鲁(卢)斯等知名人士的赞助。当1942年国民党政府解除了艾黎行政院咨询工合工作的技术顾问职务之后,工合运动处境日趋困难,艾达又竭力动员美国公众,支援艾黎在穷苦落后的甘肃山丹创办为工合培养人才的培黎工艺学校,源源不断地向山丹运送资金、器材、粮食、书籍等各种急需品,还派去了教师和技术人员。1946年6月,艾达开始了为期近6个月的工合考察旅行,参观了内地的许多合作社,并专程去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同艾黎商谈以后工作如何开展。美国委员会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为工合捐助了350万美元,不但在财力、物力上,而且在建立中美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对中国人民抗日解放战争方面给予了巨大的支持。艾黎曾表示,没有来自美国的这笔资金,工合不可能继续办下去。艾达是一个坚强后盾,有力地支持了我建立山丹培黎学校的努力。“由于有斯诺在上层活动,取得谅解;而艾达在美国群众中为工合争取支援,导致了一种新的气氛,不断取得良好的效果。艾达和埃德加·斯诺一样,也是真正伟大的美国人。”

进入50年代,美国协助中国工合委员会由于麦卡伦主义的盛行而被视为“红色”组织。艾达本人也因众所周知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中美建交的立场被吊销了护照,直到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后才重返故土。这时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已停止活动,

并入中华全国合作总社。但普艾达对工合事业的热忱依旧,她深信工业合作社在社会主义中国仍有潜力可以发挥。使她倍感欣慰的是,在她94岁高龄的时候,她亲眼看到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终于又重新恢复活动。

普艾达是一位不声不响、意志坚强的务实工作者和能干的组织者,又是一位善于体察民情民俗的作家。她出版的《汉家女儿——一个中国劳动妇女的自传》(1945)、《殷老太太——北京生活回忆录》(1979)和她本人的自传《在华童年》(1978)都是反映某一个年代中国社会和文明的写照,充满了她对中国文化及伦理道德观念的生动描述,尤其是她对劳动人民,特别是中国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无限同情,她的作品帮助许多美国人真实地了解中国历史与社会的现实,对中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是一个积极的贡献。普艾达直至去世前,一直是美中友协的名誉成员。

1988年12月23日是普艾达诞生100周年。前年恢复活动的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美国委员倡议在山东蓬莱以普艾达的名义建立一、二个工合合作社企业和干部培训学校,以纪念她对工合和中美人民友好事业的贡献。蓬莱和黄县的地方政府热情地响应这一倡议。工合国际委员会已把这个倡议列入自己的近期工作计划,正同蓬、黄两地研究如何落实。

当春风再次从渤海湾吹醒蓬莱大地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艾达早年用心血浇灌的工合之花,在她的中国故乡绽出新蕾。普艾达的名字将同工合的光辉历史和未来工合事业并存,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尤其是工合工作者的心中,将工合的未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源自《中国合作经济报》1989.8.5,作者吕婉如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艾黎研究室原主任、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原秘书长、副主席,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特邀顾问)

新西兰友人贝特兰的中国抗战情缘

牛玉林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曾得到过许多国际友人的同情、支持和帮助,他们中许多人以新闻记者的敏感笔触,真实公正地记录了中国发生的事件,传播正义的声音,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有的人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用实际行动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新西兰人詹姆斯·门罗·贝特兰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一、报道西安事变

詹姆斯·门罗·贝特兰(1910——1993),1910年8月11日出生于新西兰奥克兰市一个牧师家庭。1932年获得新西兰大学奥克兰学院硕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后,获罗兹奖学金赞助,于1936年1月来到中国北平的燕京大学进修中文和研究远东政治,并

兼任英国《每日先驱报》、《泰晤士报》等多家报社的驻华特约记者。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南京政府立即对西安进行了全面封锁,并调兵遣将,抢占西安东部屏障潼关,兵锋直达陕西渭南的华县一带。一时间,西北上空战云密布,交通为之隔绝,电信因此中断,全国舆论一片斥责张学良、杨虎城“劫持领袖”、“叛乱”,要求对其“讨伐”的声音。事变的真实情况无法达于外界,这让张学良、杨虎城等非常焦虑。

为了突破新闻封锁,张学良让因当年10月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大骂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而遭到通缉,被秘密转移到北平躲避的东北军少壮派领袖之一的苗剑秋,找到埃德加·斯诺,请他到西安报道事变真相。而斯诺因为才从陕北密访回来,正在写作《西行漫记》整理大量采访材料,无暇脱身旁顾,便推荐贝特兰作为他的代表,前往并保护苗剑秋回西安。他们于12月16日晚从北平出发,历经11天的旅途磨难,其中包括在晋陕交界的禹门口偷渡未成,被晋军守河部队在禹庙软禁了3天,几经疏通方被放行,最终于12月27日抵达西安。此时蒋介石已经于一天前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离陕。

在充满惊险和曲折的旅途中,曾是张学良心腹爱将的苗剑秋给贝特兰讲了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全部故事,使他对导致发生西安事



贝特兰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采访途中

变的前因有了清晰的认识;而到达西安后的当晚,不顾旅途劳顿,贝特兰与直接参与事变策划和实施捉蒋行动的另外两位东北军少壮派领袖——张学良身边的少校参谋应德田和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进行了彻夜竟谈,则使他了解了事变的发生经过直到现在的发展情况。进而认识到:这是一场可能会席卷全中国的伟大民族运动。我们原以为,随着蒋介石的释放,一切都结束了,而现在看来这种见解是多么的错误!这场运动必将继续下去。他由此开始了在西安长达44天对事变的考察和采访。

来西安后的第二天,贝特兰与他在下榻的西京招待所新结识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一道,由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引导,实地考察了临潼骊山事变发生时的各个现场。回到西安后,在王炳南的安排下,他和史沫特莱采访了杨虎城将军。杨虎城首先给他们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目的和意义。在谈到西安事变和当年六、七月由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发动的“西南事变”有何不同时,杨虎城答道:“我们不能用权威的口吻代表西南说话,对于任何真正的抗日运动,我们理所当然地给与最大程度的同情。但西南运动的纲领不明确——它并没有阐明如何实现其运动的目的。我们的纲领则很完善,它集中体现在张少帅宣布的八项基本原则中,这八项原则中的部分内容,现在已经得到了实行。”杨虎城进而对实行抗日统一战线作了解释:“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团结中国人民的一种信念。我们的看法是,面对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一切党派利益都必须退居其后,都必须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结成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国阵线。这不仅是一句口号,目前在中国它完全可以实现。”对于中国是否如很多人所说的那样因为国力太弱,只有在拥有较为

强大的空军和装备较精良的国家军队后,才能谈得上抗日的说法,杨虎城用“心理学”的方法作答,令贝特兰连连称奇,敬佩不已:“谁能够用抽象的理论回答这个问题呢?中国的力量不在于有多少新式飞机或坦克——这些东西日本和中国都有,但日本总会有更多。我们的真正力量在于我们懂得必须打日本的道理。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力量问题,而是要面对‘不得不打’,必须打的局势。一旦我们心中存有这种必须战斗的信念,我们就能够打下去。”在谈到释放蒋介石问题时,杨虎城指出:“长期以来,蒋委员长对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要求和抗日情绪基本没有什么认识,因为它总爱跟‘亲日派’接近。我们利用他在西安这个机会,和他系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最终使他接受了我们改变国策的主要原则。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释放了他。”

在采访的最后,杨虎城最后告诉他们:“你们需要记住的是,这次西安的‘事变’并非出于偶然,也不仅仅是两个将军的行动。它是全西北军队将士的坚定不移的要求,是广大民众长期的愿望。我们的这次行动,没有夹杂任何个人仇恨。我们只想要结束内战,进行抗日战争。我们没有说过一句反对蒋介石将军的话,最大愿望是能够与他并肩共同抗击敌人。我们的要求十分简单,这就是,‘对内和平,对外誓死抵抗侵略者!’”

西安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令贝特兰深受感染,他积极参加了到西安后的许多群众集会,发表演说,采访各界人士,表达自己对西安事变和群众救亡运动的理解和支持,并接受了西安各媒体对他的采访。当他在燕京大学的宿友,已经担任西安《解放日报》总编辑并负责西安对外宣传工作的张兆麟邀请他参加西安广播电台的英语广播时,他立刻答应

下来。他针对外媒对西安事变的不实报道,结合自己在西安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采用英国国际广播电台BBC的新闻传播方式采写和播发稿件,很快引起了各方关注。南京政府的发言人竟对外宣布说:“西安电台现在的播音员是一个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英美使团也开始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一位过去在北平认识贝特兰的英国传教士得知情况后,曾到宾馆当面斥责他:“你的播音是在西安外国人的耻辱”。贝特兰据理反驳道:我只不过报道了我亲眼所见到的事实,其中包括共产党宣布的不损害外国人和传教士利益的政策。这难道不是大家都需要关心的吗?这位传教士后来把情况报告给了英国使馆。因担心南京政府施压,英国大使馆给他发来电报,命令他停止帮助“叛乱分子”,不要作出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举动”。在此情况下,经过周密安排,由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王炳南的夫人王安娜,接替了他的播音工作。但贝特兰依然用容易为西方人接受的方式为电台编写稿件,直到西安事变结束。英国档案馆长期保留着英国驻华使馆对贝特兰当时播音的评论:“这位男性播音员显然是一位俄国人,因为采取莫斯科英语新闻节目风格,模仿英国广播公司海外节目的口音。”

贝特兰对西安事变的最大贡献,是他把在西安的所见所闻结合自己的考察研究,以最快速度记述下来,这就是1937年由英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危(Crisis in China)》。其美国版于次年出版,书名改为《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密闻(First Act in China The Story of the Sina Mutiny)》。该书是最早也是唯一由外国人公正客观全面讲述和评介西安事变的专著。在这部扉页上印着“向东北义勇军致敬”的书中,贝特兰从维护国际和平的视点出发,不仅把西

安事变看作是内战分裂的中国走向全民团结抗战的转折点,也看作是远东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张学良带着义无反顾,蔑视一切神情高擎的造反旗帜,就是一面民族防御、民主团结的旗帜。蒋介石所面临的选择,就是要内战,还是要国内和平;是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还是要继续进行民族革命的斗争”。“这种选择对中国人民的未来至关重要——从1936年12月到1937年7月,这是一个多么短暂的时期。现在,他已经成为中国能够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从这一点看,西安事变也必定成为远东国家关系发展史的一个转折点”。“今天,日本的眼前目标可能是华北,明天就是华南和菲律宾。在如今这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里的最大不幸,就是人们不得不花费如此漫长的时间弄明白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对中国独立的威胁就是对所有与太平洋相关国家的挑战。它作为法西斯主义侵略攻势的一部分,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公然挑衅。”

二、投身支持中国抗日战争

完成有关西安事变的书写作后,贝特兰于1937年5月前往日本进行考察,于“七·七事变”爆发后立刻返回了北平。北平陷落前,他与埃德加·斯诺护送在北平西山医院治疗肺结核病、化名“李知凡太太”的邓颖超和几名中共干部,乘火车到天津后乘轮船到烟台,然后由爱泼斯坦继续护送回到陕北。此后不久,应毛泽东邀请,贝特兰作为第一位来自英联邦国家的新闻记者,于9月底来到延安。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对毛泽东进行过多次专访,“毛选”第二卷中有《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他在英国《每日先驱报》等报纸发表的采访毛泽东和延安各党政军机关、抗日军政大学、军队和李德、张国焘等人的系列报道,对英美等国在抗战初期更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政治、军事等政策和策略,发挥了积极作

用。而后,他东渡黄河,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晋南、晋北等地考察了3个多月,采访了周恩来和朱德、彭德怀、贺龙、萧克、左权等著名将领,写了重点记述八路军战地生活剪影和许多战斗场景的《华北前线(North China Front)》一书,于1939年在英国和美国出版(美国版为《不可征服的人——在华北战斗农民中间一年多的惊险旅(Unconquered: Journal of a Year' Adventurs among the FightingPeasents of North China)》。



萧克与贝特兰

1938年2月,贝特兰来到武汉,见证了中日空军的武汉大战,并把自己的全套旅行衣物,送给了即将前往华北的白求恩大夫。现在人们看到的白求恩照片中的装束,很多是贝特兰赠送的。在与周恩来会面后,他手持周恩来的亲笔信来到香港,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宋庆龄,向他报告了八路军急需医药等援助的情况,并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的筹办。然后作为宋庆龄和“保盟”的特使,他到美国和英国和菲律宾为中国抗战募集了大量医药等援助。为了将这些物资尽可能送给最急需的八路军,他将在越南河内接受的30辆

卡车、600多箱的医药和15000加仑汽油等物资,辗转万里克服无数凶险,亲自押运送交给了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这批物资支持在延安建立了好几个“和平医院”。返回香港后,他继续为“保盟”办会刊,担任负责对外宣传的秘书,并短期任英国驻华使馆的救济与新闻参赞,负责把英国援华物资从仰光沿滇缅公路运入中国。日军入侵香港时,他第一时间把情况报告了宋庆龄,并协助她和宋霭龄等及时离港,然后扛着机枪参加了保卫香港的战斗,在赤柱曾“至少射杀了一名日军军官”。战争失败被俘后,他在香港和日本东京的大森战俘营中各关押了两年左右,身心蒙受极大摧残。他亲眼目睹了东京遭到美国飞机报复性持续大轰炸后的惨状,认为这是对日本飞机轰炸中国无数城市和平民的“报应”,“还加上了利息”,见证了日本的最后失败和盟军对他们的解救。后来他把在华经历包括在战俘营所受的磨难,写进了《战争阴影:一个新西兰人在远东 1936—1946》一书中。1947年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他曾公开预言:中国共产党必然会打败国民党。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基础在农民中间,它的军事和政治领袖都可以压倒蒋介石;蒋介石的军队会像日本军队一样,成为军火运输队”。这是多么高瞻远瞩的预见。

三、新中国的老朋友

贝特兰是靠英国罗兹奖学金到中国学习中文和研究远东政治的,原定计划只有一年。由于采访西安事变写了《中国的危机》,又延续了一年。他的热爱和平,反对法西斯主义和主张社会民主公平公正的理念,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理念高度契合。随着他到西安、延安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考察和采访的不断深入,结识更多的共产党人和高层领袖,以及对中国社会更深刻的研究和认识,他成

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支持者,将其视之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因此,他竭尽可能甘冒风险,宣传抗日统一战线,为八路军等敌后武装募集、输送最急缺的物资。他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共患难的朋友。



晚年贝特兰。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新西兰与中国直至1972年才建交,但贝特兰早在1950年就发起成立了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并是协会的长期赞助者。他于1956、1957、1982和1986年4度访华,拜访和会见了已成为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贺龙、彭德怀等和在国家重要岗位任职的黄华、廖承志、陈翰伯等许许多多抗战时期老朋友,把盏言欢,共叙友情,感到无比高兴。他先后出版发表了《重返中国(Return To China)》、《今日中国的年轻旅者(The Young Traveller in China Today)》等著作和大量文章,忠实记录和报道了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1993年8月24日,贝特兰逝世,享年83岁。

(作者单位: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

(上接16页)工合运动始终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都是工合协会的理事,有一大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成为它的中坚骨干力量。工合也是宋氏三姐妹唯一共同赞助的事业,宋庆龄是中国工合协会的担保人和香港工合推进委员会的名誉主席;蒋介石、宋美龄先后任协会的名誉理事长;罗斯福总统夫人是美国援华委员会(含中国工合)的名誉主席等。抗战时期“工合”是国共合作、全民族团结抗日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鲜明标识,为民族复兴做出了历史贡献。

卢虎(卢广绵的长子)编注的《卢广绵与西北工合》是一部记录抗战时期及战后(1931-1948)西北工合运动的历史资料书。根据当年的工合期刊、报刊等资料,以卢广绵先生的经历为线索,大体按时间的顺序整理编辑。是抗日烽火中工合员工:工人、难民、乡村妇女、伤残军人、知识分子、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包括香港同胞、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他们的生活工作,理想追求,为发展大后方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为民族救亡图存复兴所作历史功绩的记录。

全书上下两册,分序篇、上篇、下篇三部分:序篇介绍卢广

绵先生走向工合,工合与它在西北发创前后的情形;上篇共31节,记录西北工合早期并且于1943年之前结束了的工作,并附1940年6月西北工合出版的姜漱寰女士著《工合运动在西北》一书;下篇有36节,记录西北工合各地与战区事务所的工作进展,工合新村、学校、医院、金库、试验厂、纺毛站……及工合缩编改制等资料。这些事情是延续至或发生在1943年以后,对战后不够完整的资料,附在有关各节的后面。

这是一部让历史在说话的书,其所含资料的广泛详实与编辑的系统精细方面,都堪称珍贵难得。它的出版是对中国工合运动和抗战时期西北大后方建设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作者简介:

卢虎 1936年1月9日生于北京,卢广绵先生长子。

抗战时期在宝鸡工合小学成长,之后在南京、瑞士日内瓦和北京上学。1951年7月参加人民海军曾任海校助教教员,立三等功三次,1962年入党。1966年赴青海农建师任指导员宣传干事,1973年开始在青海师范大学数学系任副教授至1996年退休回北京。

辉煌70年：致敬《中国建设》杂志创刊老前辈

编者按：铭记历史，缅怀前辈。在《今日中国》（原《中国建设》）创刊70周年之际，《今日中国》原总编辑陈日浓先生简要追忆创刊前辈为杂志的创办与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致敬他们的创业功绩。

金仲华（1907—1968）

作为《中国建设》的创始人之一，金仲华是中国新闻界老前辈和国际问题专家，也是宋庆龄的挚友与助手。他是应宋庆龄邀请，与陈翰笙一起创办这本新中国对外英文刊物的，是我刊的首任社长。

新中国成立后，金仲华历任上海市副市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等领导职务，并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兼《新闻日报》和《文汇报》社长及中国新闻社负责人，同时担任新中国第一张英文报纸《上海新闻》总编辑。



金仲华

1951年8月30日是我刊值得特别铭记的日子。这天宋庆龄在上海常熟路157号中福

会新址的会议室，主持创刊重要筹备会。具体由金仲华精心安排，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国外友人等出席，商定了新刊的宗旨，读者对象及编辑方针。新中国的一本对外刊物从此扬帆起航。

1951年的冬天，是金仲华最繁忙的时刻。他除了上海市的市政领导工作外，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争取《中国建设》创刊号的提前出版。从筹措新刊经费，登记出版手续，到选定纸张和下厂印刷，他事无巨细，亲自督办。终于在12月5日拿到新刊，他立即呈报宋庆龄。宋庆龄高兴地翻阅后，于17日给金仲华复信：“请接受我深切的感谢，但愿我们所做的以及今后要做的努力将使我们的杂志成为向世界介绍中国和增进和平的强有力的杂志”。

尽管金仲华政务繁忙，自1952年1月《中国建设》正式创刊后，金仲华作为社编委会主任仍十分关心杂志的发展并给予悉心指导。他不时为杂志撰写重要文稿，使其逐渐成长为新中国一本具有影响力的综合性、多语种的刊物，受到国外读者的欢迎。他为新中国的对外传播和对外友好交往，付出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宋庆龄晚年怀着对挚友的深情撰写了《怀念金仲华——〈中国建设〉的创始人之

一》，文中宋庆龄高度肯定金仲华的贡献，称赞“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进步事业”。

陈翰笙(1897-2004)

1951年初秋，在北京中山公园一个僻静的地方，长凳上坐着两个人，他们并不观赏秋色美景，而是专心致意手中的英文稿。戴深度眼镜的中年学者是陈翰笙，而他身旁的助手是位文静的女士。他们正在此编成《中国建设》的创刊号。陈翰笙晚年的回忆录中说，“1951年筹办新刊，一开始，我们连个办事的地方都没有，创刊号是我与李伯悌在北京一个公园的长凳上草拟的”。

陈翰笙是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前辈。他是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美国柏码拿大学，先后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和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精通英德俄等多种外语。1924年，他接受蔡元培邀请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1925年，由李大钊介绍，陈翰笙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革命事业。

陈翰笙与宋庆龄相识于1927年冬天的莫斯科。当时宋庆龄首次出访苏联，也抵达莫斯科，据陈翰笙回忆，“这年寒冬的一天，由我的朋友邓演达同我到红场附近的苏维埃旅馆去拜访宋庆龄，这是我第一次同她见面。”此后两人开始了联系与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急需外语干部。1950年周恩来总理托人告知在美国的陈翰笙希望他回国工作。这样他于1951年1月31日回到北京。当时周总理正与宋庆龄商议创办新的对外刊物。1951年3月底的一天，宋庆龄约请陈翰笙夫妇到北京方巾巷住所，商量办刊事宜。令陈翰笙没想到的是，当晚周总理也去了。陈翰笙记得这次见面时，周总理对他说起办杂志的事。陈翰笙表示要有一批人，让金仲华打头，我可以帮忙。于是陈翰笙去上海找金

仲华，要他牵头办刊，做编委会主任，他做副主任。

1951年5月至6月间陈翰笙曾三次致信宋庆龄，商议新的对外刊物的名称，最后宋庆龄选定刊名为China Reconstructs(中译刊名《中国建设》)。陈翰笙在6月18日复信说，你建议杂志取名China Reconstructs，意义深远。它意味着中国不仅在国内重建，而且还帮助世界上其他地区进行建设。而且还借以纪念孙中山，因他生前曾办过一份名为《建设》的刊物。

1951年8月宋庆龄约请金仲华、陈翰笙及有关人员，在上海召开了创刊筹备会，商定新刊的编辑方针。经过北京上海两地紧张的合作筹办，1951年12月5日《中国建设》英文版样刊问世，初为双月刊。后以1952年1月为这本杂志正式创刊时间。刚出版时，只有6名工作人员。杂志在北京编译，上海出版发行。为保证杂志质量，陈翰笙全力投入，他说当初几乎每篇稿都看。作为编委会副主任，他负责杂志的英文审定稿，也不时撰写有关国际的文稿，一直忙到1958年唐明照接任。



陈翰笙与邱茉莉研究杂志

陈翰笙曾历任外交部顾问，又兼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和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还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

员。这位跨越三个世纪的传奇老人于2004年3月13日辞世,享年108岁。作为国际问题专家学者,陈翰笙留下诸多专著,如《美国垄断资本》《印度莫卧尔王朝》《中国农民》和《陈翰笙文集》等。

唐明照(1910—1998)

唐明照也是位革命前辈和资深国际问题专家,多年在国内外从事国际交往联络,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58年,为加强对《中国建设》的领导,经周恩来总理和宋庆龄的同意,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委派唐明照兼任杂志总编辑。



唐明照夫妇与大女儿唐闻生、二女儿唐建生的家庭生活照

尽管外事工作繁忙,唐明照还是很关注杂志工作。他亲自主持召集社外知名人士的编委会,研究杂志重要事情。他来杂志社时,多是夹着厚重的公文包,到四楼副总编办公室或会议室研究工作,匆匆来去。他密切关注国际舆论,不时撰写针对性很强的文稿。

1960年1月6日,宋庆龄致信唐明照,鼓励说杂志有进步,但望继续努力。宋庆龄说:“我很喜欢第一期杂志,从头到底都很生动有趣,而且效果一定会很好。我特别喜欢这期的封面,整本杂志的编排比前几期有进步。在这方面当然还存在重要改进之处,但就这一期来说,编得很好。”

1962年元旦刚过几天,北京百万庄外文

大楼依然洋溢着节日的气氛。1月6日这天中午,唐明照早早赶到《中国建设》杂志社,再查看一下今天创刊十周年的庆典准备情况。下午他和编委会主任金仲华见面后,即到大门迎接贵宾——周总理、宋庆龄、陈毅、邓颖超、廖承志等,陪他们上四楼参观杂志创刊十年展览,亲切会见编辑部中外同仁,合影留念共贺创刊十周年。庆典还邀请社会文化界知名人士参观展览,争取他们对杂志的支持。这是杂志社最盛大的节日,也是唐明照从1958年到此就任总编辑后操办的一件大事。

唐明照主持《中国建设》杂志工作直至1966年。1972年4月,由中国政府举荐,被外交界誉为“美国通”的唐明照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成为新中国在联合国的首任副秘书长,具体负责联合国的政治事务,非殖民化及托管地的工作。在国际社会,他充分施展自己独特的外交才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79年离开联合国回京后曾任中联部顾问、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继续致力于中国与国际的友好合作,直到1994年离休。

鲁平(1927—2015)

鲁平,历任中国建设杂志社副总编,国务院港澳办秘书长、副主任、主任,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福利会副主席、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主席。



鲁平

早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期间,鲁平就对宋庆龄不畏强暴、支持进步事业的革命精神敬佩不已。作为爱国学生,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的争民主、反饥饿斗争,1945年他加入中共地下组织,成为积极分子。他在校学的专业虽是农业经济,但他外语很好。

1947年,鲁平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不久,就踏进中国福利基金会(中福会前身)的大门,开始国际联络工作。之后参加杂志创刊工作,并成为社里最年轻的领导干部。

据说,有一天他正在办公室埋头于打字机前,认真处理外国来信。突然身后传来亲切的上海语音:年轻人,你的英文打得很快啊!他猛回首,原来是宋庆龄站在身后,她那亲切音容,很快化解了生疏为亲近。他立即站起来用英文向孙夫人问候。在简短的英文交谈中,这位年轻人的英文水平及处理信件之利落,给宋庆龄留下颇深的印象。此后鲁平在中国福利会担任办公室负责人,并参与筹办《中国建设》。

在中国福利会工作大约两年后,为了杂志工作的需要,鲁平调到北京,担任杂志社的办公室负责人,尔后晋升为副总编,是当年三位副总编中最年轻的领导,主管杂志社的政治思想和行政工作,兼管经济报道。鲁平是唐明照的得力助手,主持全社工作,由他负责向宋庆龄和唐明照汇报工作,也不时得到宋庆龄的来信指示。

1978年,时年51岁的鲁平从《中国建设》杂志调到港澳办工作,从此未曾离开,直到离休。不久便担任港澳办公室秘书长,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1990年,鲁平作为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参与中英谈判中方代表团工作,为香港回归祖国作出特别贡献。鲁平是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他离休后,于1999年6月出任中国福利会第一副主席,仍致力于宋庆龄的事

业。他晚年留下本一回忆录口述香港回归。

李伯悌(1918—1996)

李伯悌是陈翰笙创办《中国建设》杂志时的助手,也是这本期刊的首席英文编辑记者。她年轻时留学美国,回国后1945年先后担任美国《时代》杂志驻重庆、上海分社记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



在北京四合院内的编辑部工作人员合影
(前排左三为李伯悌)

这位年轻女记者也是位革命前辈。1937年,她在南京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8月在武汉大学加入共产党,任该校地下党女生支部书记。

1951年夏天,陈翰笙筹办新刊时,首先物色的人才就是她,故他亲赴天津约请李伯悌到北京参加筹办《中国建设》杂志。

那时因为没有办公地点,李伯悌和一位女资料员常常带着资料到中山公园去写文章,杂志创刊号的许多文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创刊后,李伯悌先后担任编译组长、编辑室主任,1958年任副总编。她主管英文部及政治社会报道。她十分重视培养年轻编辑记者,主张赶鸭子下水多实践,也不时带记者外出采访。她多次出国访问。196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她被中央挑选担任中国代表团翻译组长。1980年,李伯悌参与英文《中国日报》的创建,任副总编,是全国政协第五届、第六届委员。

(本文来源自《今日中国》微信公众平台
2022.5.16,作者陈日浓系《今日中国》原副总编辑)

讲好艾黎与少数民族的故事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周多星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是近百年来华时间最长,对中国贡献最大,最受中国人民尊敬的具有大爱情怀和奉献精神的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候,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同斯诺夫妇、史沫特莱、乔治·何克、马海德等国际友人一起,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宣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极搭建平台,创办工合事业,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把西方国家先进的文明思想和发展理念,带入中国的大西北,他创办培黎学校为山丹及周边各族贫苦农民的孩子找到了学文化、学技术的出路,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

作为一名外国朋友,他是“一带一路”的先行者,是沟通世界各民族和中华民族友谊的架桥者,是世界民族大团结的先驱和榜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者。艾黎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华60年里,到过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与许多少数民族老百姓结下了深厚友谊。深入挖掘和讲好他和少数民族的感人故事,弘扬他大爱无疆的国际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的人道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的艰苦奋斗精神,坚韧不拔的创新创业精神,必将为

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和奋进源泉。

艾黎的一出生就和少数民族结了缘。1897年12月2日,路易·艾黎出生在新西兰克萊斯特彻奇市斯普林菲尔德镇,姑妈艾米按当地少数民族毛利人首领的名字给他起了名字。那位路易·曼尼亚波托是19世纪60年代毛利人抵抗英国军队入侵的土地战争的传奇人物,艾黎的青少年时期,一直以他为学习的榜样。追求公平正义也成为了他毕生的追求。

艾黎特别喜欢中国多元、包容的文化。一战后,1927年4月21日,艾黎从新西兰到澳大利亚悉尼乘澳大利亚货轮“卡卢鲁”号,经香港到达上海十六铺码头,这是艾黎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上海工部局消防处找到了一份工作,后被任命为消防处队长级的督察。工作之余,艾黎到各地旅行和调查,曾到内蒙古做过血吸虫病调查。还到中国周边国家朝鲜、日本考察,还对佛学进行研究,在苏州、昆山、杭州、舟山等地的寺庙访问。

艾黎的第一次公益活动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1929年夏天,经约瑟夫·贝利介绍,艾黎利用休假到少数民族地区绥远参加赈灾和

修建民生渠的工作,在萨拉齐修建了从黄河到黑河,穿越平原,长达80公里的水渠和电话杆线,并且在赈灾工作后收养了孤儿阿兰。

他积极倡导“工合运动”,支持中国的抗日民族救亡。抗战爆发后,艾黎倡导的工合运动是一项致力于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的几乎覆盖全国的工业合作计划。“9.18”事变后,中国的工业遭到日本侵略者的破坏,艾黎同埃德加·斯诺夫妇等人倡导发起了“工合运动”,在非敌占区将失业工人和难民组织起来,建立工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生产救亡,解决军需民用,支援抗日战争。这项运动得到了国共两党的共同支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延安等地都设立了办事处,这一跨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边缘组织成为维系国共合作的另一条统一战线,更加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团结,支持了中国的民族救亡事业。1939年,艾黎在在川康地区设立了工合办事处,这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最早设立的工合组织。他们在阿坝藏民地区收购羊毛,为抗日部队生产军毯。与此同时,他们还在云南、广西和贵州都设立了工合组织。同年,他促成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从美、英、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促进委员会得到的经济支援约五百万美元。1938年到1941年,是工合事业发展的最好时期。全国各地的工合组织,从1938年底仅有的69个到1940年底达到1780多个,月产值达2400多万元,分布在16个省(1941年达到18个省),有社员两万五千多人,援助了二十多万失业者和难民。工业合作社遍及全国非敌占区,设有30个办事处(见图表)。越来越多的合作社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建立起来。工合生产的军需民用产品,在支持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创办“沙漠医院”,惠及周边牧民。1947年,艾黎在新西兰海外救济总署的支持下,罗伯特·斯宾塞和他的夫人芭芭拉·斯宾塞来到学校,并带来一些医疗器材。学校利用可能找到的所有设备建起了一所校办医院。斯宾塞带领孩子们制作病床,还盖起了一间手术室和一间放置显微镜和X光透视机的房间。学校把医院作为学生的实习场所,无偿为当地及张掖、武威和内蒙古地区的百姓看病,受到山丹和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欢迎。阿拉善一位王爷的儿子患了眼疾,久治不愈。听到山丹培黎学校有洋大夫治病,慕名带儿子前来看病。待眼疾痊愈后,以蒙古族隆重的礼节赶来五只羊答谢。从此,培校医院有神医的传说在草原上广为传播。

他立足西北,创办培黎学校,影响深远。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破裂,工合运动因与进步势力关系密切遭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压制,发展越来越困难。路易·艾黎逐渐把精力转移到建立工合培黎学校上来。1941年,他在陕西凤县双石铺创办了西北的第一所培黎学校。1944年底至1945开春,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和英国人何克分两批把学校迁往山丹。学校选址于山丹发塔寺(现山丹县医院附近)。和其他学校不同的是,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不仅主要招收贫苦人家的孩子和战争中的孤儿入学,而且学生中有许多少数民族学生,有来自云南的纳西族学生,还有宁夏的回族学生。他们中有一个蒙古族学生叫年太,艾黎关照他,把他分在了测量地质组。在教师们的严格训练下,掌握了扎实的基本功。解放后在玉门油矿参加工作,手绘图纸堪比机械制图,得到了时任石油部长康世恩的点名表扬。

他积极倡导 恢复培黎学校重建,造福西北桑梓。1987年,他还促成了培黎学校重

建。在艾黎来华60周年之日,恢复重建的山丹农林牧学校正式开学,并举行了开学典礼。1994年,山丹农林牧学校更名为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2006年12月,山丹培黎学校被国家教育部认定为“国家级重点中等专业学校”。2020年,山丹培黎学校已发展成为一座有相当规模的职业大学。有教职工112人,少数民族教师2人,少数民族学生169人,包括蒙古族、藏族、回族、裕固族等。多年来,学校秉承艾黎先生办学宗旨,立足西部实际,积极发挥为西部地区,特别是青海、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作用,培养了2万多名实用型技术人才。

他深知文化认同,是民族之根,民族之魂。艾黎热爱中国文化,特别喜欢少数民族文化。当年路易·艾黎带领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学生在挖渠时发现了许多陶罐和陶片,他邀请考古专家前来鉴定,正式命名为“四坝文化”,将丝绸之路的人类文明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轰动。这种文化类型内涵丰富,特色独具,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一支含有大量彩陶的青铜文化,距今3900年—3400年,四坝文化在见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同时,也成为了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民族符号之一。

他常常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考察了解,想方设法予以帮助。1952年以后,艾黎利用各种机会,去中国各地参观访问,赴工厂、进农村进行社会考察,足迹踏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其中,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是他关注的重点。1957年赴新疆进行考察,和孩子们一起跳维吾尔族舞蹈;就是那次新疆之行,朋友送他一顶维吾尔帽子,他特别喜欢,以后出门常常戴着。1958年在西双版纳考察傣族人民与脑型疟斗争。1973年再次赴阿坝参观。1979年在甘肃省肃南县考察,艾黎了解到肃南人口少,牲畜多,劳动力紧张后,他提了两条建议:一是在人

烟稀少的牧场打井,不用机器抽水,而用风车抽水;二是训练牧羊犬放羊。他向当地牧民介绍,在他的家乡新西兰一个牧民的几条狗可管理一、二千只羊,可大大节省劳力。在山丹办学时,艾黎与周边临县的蒙古族、藏族、回族、裕固族都有密切接触和广泛交流。1981年秋他到广西考察时还专门到东兰悼念韦拔群(壮族)烈士并看望其母亲,他还给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写信,对广西的土地利用问题提出宝贵的意见。艾黎一生情系西部,惦念山丹。他把毕生收藏的文物捐给了山丹县。他说,中国的西北,特别是丝绸之路今后一点会成为旅游重点,把这些文物放在山丹,会促进山丹的发展。甘肃省、山丹县政府十分重视艾黎的义举,拨付专款,按照艾黎的心愿,在“陈家楼”原址上新建了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他常说,新西兰是我的家乡,我以后会常回家的。我说的新西兰不是真正的新西兰,而是新疆、西宁和兰州。

他倾心中华民族文化研究,著书立说,广为宣传。路易·艾黎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特别重视把各民族的文化精华把中华文明传播到国外,传播到他的家乡新西兰,促进了中外和中新文化交流。晚年的艾黎,居住在北京对外友协友谊馆。艾黎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他喜欢收藏陶器、玉器、瓷器、书籍、古玩等,他的收藏中,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文物,他收藏的匈奴玉器、骨器和青铜器是全国最多的,他还著有《瓷国游历记》一书。艾黎一直坚持中文学习,还翻译中国古诗词,向世界介绍中国历史和少数民族文化。艾黎先后翻译了《杜甫诗选》、《白居易诗选200首》、《李白诗歌200首》、《唐宋诗选》和宋代苏东坡诗165首等。总共翻译和著述作品达69部。

透过路易·艾黎的斑斑足迹,重温他和各民族兄弟的深情厚谊,我们可以看到和感知,

在中国革命史上,他无愧是一位具有大爱情怀和奉献精神的国际战士;在人类文明史上,也称得上是一个跨越文化边界、彰显人类文明的大写的符号。路易·艾黎是新西兰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透过这些精神的光芒,我们看到了艾黎在华60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这些伟大精神的践行,也将引领着山丹人民乃至全国人民进一

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深入学习、挖掘、研究艾黎、培黎和工合历史,讲好艾黎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故事,弘扬艾黎大爱无疆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任重道远;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我们义不容辞!

(作者:周多星 系山丹艾黎纪念馆副馆长)

■艾黎诗选

家

每天早起,我对着宜兴的
古陶茶壶,来自景德镇的
青瓷杯盘,不禁微笑。
家么,它是这样的地方,心爱的
零星用具在这里存放;
亲朋好友在这里聚会,他们的
欢声笑语,连四面墙壁
也发出回应;花花草草
在这里生长,而重大决定也是
同日常的生活交织;从大西洋,
从美洲和欧洲,人们来到这里
谈笑风生;家么,它又是后方基地,

去内地旅游便是从这里启程;
这里总有欢乐的思想
在每一度春天里跳进
生活,也把金色的光束
照满每一个秋季。

这就是中国赠给我的
温暖的家,我应该
怎样来感谢?

1977年10月25日,北京。

陈敬容 译

关于新西兰友人艾启赫的四份史料(三)

秦泉安

编者按:上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先后有来自8个国家的30名外国专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护士来山丹培黎学校任教和工作。艾黎在自传中写道:“除了始终存在的财政困难之外,我们还发现,要想动员中国教师去荒凉的西北工作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学校虽也有中国教师,但如果没有约30位来自8个国家的外籍教师的协助,学校是办不好的。这些外籍教师在不同时期是由不同的国际组织派来的。有些时候,我们感到走投无路了,接着障碍被克服了,外援来了,学校才得以继续办下去。何克接办双石铺的培黎学校之后,设法请来在公谊服务会派到中国工作的恩迪·布雷德和罗伯特·纽威尔来协助工作,在山丹招聘后勤工作人员就更困难。公谊服务会又一次帮忙,派新西兰会计师考特尼·阿切尔(艾启赫)来协助。考特尼的事业心很强,他建立起学校的财会制度,还培养了一名工作人员。”除了艾黎、何克外,这些外籍教师的史料非常罕见。工合运动研究学者秦泉安先生翻译、整理了4份有关艾启赫的珍贵资料并发来本刊,现刊发第三部分,以飨读者。

一篇 Aotearoa(奥特亚罗瓦;毛利语新西兰的意思)建筑学历史论文中的考特尼·阿切尔(Courtney Archer艾启赫,1918-2002)

在2008年一份叫做AHA(Architectural History Aotearoa—建筑历史追踪)第5:56~56卷的研究论文中,就一份研究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建筑学术的论文,标题是“科特尼·阿切尔是谁?”的文章。其中整理分析了研究者找到的一些有关建筑方面的论文,作者是年轻的(当时23岁)科特尼·阿切尔所撰写的建筑学方面的论文,研究和观点,也有部分内容专门论及对于他个人经历的研究。

1. 论文发表于1942年的《建筑评述 Archi-

tectural Review》。撰写者是一位年轻人,没有接受过正规建筑学的教育(who had no formal training in architecture);他的从业经历仅局限于农业工业,且其居住的区域属于南岛上端(Upper South Island)一个小的园艺社区;这里的建筑业发展很差;

2. 战后,阿切尔在中国工作过八年,且大部分时间始于一个著名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在一起工作,而因为他非常走近艾黎且深得艾黎的信任,在很多场合,他被认为是艾黎的左膀右臂(Right Hand Man);他也长期被人记起,“说他是艾黎从未被公开的同性朋友”。外界有一篇文章,专门写到(作者:Cam-

eron)《路易·艾黎的助手》《中国的朋友》;

3.此时,阿切尔有十多篇建筑方面的文章在不同地方的建筑领域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他是一个建筑专业的外行,但他的视野、观点、对于建筑学的直感有充分体现在论文中;

4.阿切尔生于一个坎特伯雷城北的 Rangiora 镇的面粉加工场主家庭。他于 1933~1935 年在 Rangiora 高中上学;当时的中学校长是激进的 James Ernest Strachan 先生;由于阿切尔的父亲对于该校长的这种开明的方式不认同,随之转校到位于 Oamaru(奥马鲁,新西兰南岛的一个中小型城市)的 Waitaki 男子学校(怀塔基男子中学),到那儿他才得以完成其中等教育(译者注:著名的新西兰记者、国际友人贝特兰就是该校校友);

5.阿切尔并没有接受过中等教育以上的专门教育,尽管他有建筑学的天赋,其父亲希望他可以并鼓励他在接手家族的面粉加工厂前可以到小麦研究学会(Wheat Research Institute)谋到一份工作;阿切尔关于建筑研究的理论、研究、想法多来自此时他的学校课程、和他接触过的艺术家、知识分子的辅导;

6.克莱斯特彻奇所有的一些英国建筑、风格的存在;有人也认为,阿切尔可能此时好友是年龄相仿的 Angus 的妹妹 Jean;据说后来他还接触或参加了和平承诺联盟(Peace Pledge Union),或者他们都是在此时对中国艺术产生兴趣。他们会经常到剑桥露台公寓(Cambridge Terrace Flats)相聚和交流,这是 1930 年代在克莱斯特彻奇著名的一个汇聚艺术家、作家、知识分子和音乐家的聚居地。阿切尔在此涉猎广泛、在于各种活动,包括民间舞蹈、阅读、讨论等。

7.战争爆发后,他已经形成的和平理念和承诺引领他去思考和考虑其他目标。他们组织呼吁人们拒服兵役,而当时的坎特伯雷上

诉委员会处于同情的原因还免于对他们进行起诉(几乎 35%的参与者)。但是阿切尔的父亲却无法忍受他的这种立场,把他赶出家门,他不得在他家的面粉加工厂工作。于是,他和一群朋友选择到中南岛的一家园艺工厂去工作,这样也符合他们作为和平主义者的意向选择。再后来,他们也到其他农场去从事烟草采摘的劳动工作。不久,他的几个挚友加入,他们又组成幸运的紧密联系的团体,无话不说。

8.阿切尔加入并参与河边社(Riverside-Communal Life)长达三年之久;河岸社区(Riverside Community)是新西兰现存历史最久的理想社区;在此,他结识了很多思想现今且热爱和平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有些在艺术、建筑方面有思想,有些可能就成为阿切尔的论文的来源。比如说 Bruce Godward 和 Pascoe;他们在这里加入和共同居住在 Pascoe 的 Clifton 草屋,后来 Jean 和 Fred 结婚后就在 1943 年搬到了 Greymouth 去居住;

9.尽管阿切尔可能不是委员会的成员,但因为他的背景、经历和理念,他可能是主要成员之一,并参与过计划项目。

10.据说,阿切尔曾经接受社会主义理念,在其建筑论文中表现出来,讲过“人民是所有良好社会的文化之源”。估计,他在 Waitaki 男子学校的室友介绍他参加诸如“左翼书俱乐部(Left Books Club)”。后来还有成立一个左翼书 Rangiora 或 Christchurch 分部;通过阅读此类书籍又结识许多朋友。(译者注:很多二战期间的书籍,有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乔治·何克的《我看到了一个新的中国》等书都出自这个书籍出版项目,由英国的 Victor Gollancz 出版社最初出版的)。

11.1944 年,他有随朋友离开河边社区加入位于 Otorahanga 社区。时间不长,他就到葛雷河(Grey River Argus)杂志谋到一份记者的新职

务,与他的和平主义朋友Fred Jones等一起工作。

12.1945年,阿切尔跟一小群新西兰朋友一起申请加入了英国的英国公谊救护队FAU,这是一个基于人道救护和公益理念,由英国基督教组织贵格派组成的分散到战争难民区的国际救护组织。自此,阿切尔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理念。据记载,他是1945年5月24日离开新西兰,经过长途跋涉和旅程,到当年7月份抵达中的曲靖。他非常喜欢FAU的宗旨和服务理念“去往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Going Anywhere and Doing Anything”。他首先是接受配成成为一个在医疗救护部门的麻醉师,后来是一所医院的执行经理、一所新建医院翼楼的建筑设计师、一套排水系统的工程师,最后担任FAU在上海分部的财务官员;此后,他就选择前往山丹培黎学校与路易·艾黎一起工作。

13.即使在中国辛勤工作的那么多年,他对于建筑的研究和兴趣一直继续,因为他认为这是“人民的建筑”,而中国的建筑特色和风格使得不得忘怀。尽管因为战时工作条件和环境,他没有继续研究建筑学,但他在给朋友的长信中有很多记叙和描写。他对他所看到的颇有兴趣:“中国的屋顶在天空的映衬下是一幅美丽的风景,我相信我再也不会对平屋顶有同样的感觉了。”还有,建筑高达15层或16层——不是新哥特式的帝国主义宏伟风格,而是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简朴模式——只是为了挣钱和更多的钱。中国商人决心表明他们像欧洲人一样善于玩资本主义游戏而政府在那里支持他们作为社会的支柱,建筑高达15层或16层——不是新哥特式的帝国主义宏伟风格,而是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简朴模式——只是为了挣钱和更多的钱。中国商人决心表明他们像欧洲人一样善于玩资本主义游戏而政府在那里支持他们作为社会的支柱。他对新建筑的胃口也受到了20世纪40

年代中期在上海的表现的影响:

14.艾启赫回国后,除过经营管理他家族的面粉加工厂以外,他还记叙热衷于建筑,他特别设计了自己的宅院;

15.另外,艾启赫肯定还为其他朋友设计过其它的房子。他的长期朋友陈潭相信,艾启赫肯定在惠灵顿山边上还设计过一套房子。另,他的妹妹June Raymond也理解,他在Rangiora给朋友设计过一座房子。

16.2008年,新西兰但尼丁市建立了一座中国风格独特的公园,叫澜园,与上海的豫园是姊妹公园,据说在该中国公园设计建设过程中,从中国太湖运来500多吨的特色石头用于基础建设。在2018年中国园落成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还展出了一座由路易·艾黎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附近收集且交由艾启赫后来运回新西兰的一座中国清代佛塔(陶瓷)。由艾启赫和他的长期挚友Chen Tan以他俩的名义捐给该中国澜园。

17.艾启赫后来从英国公谊救护队(FAU)工作转入山丹培黎学校(Bailie School),这次转变及后来的工作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历程。两年后,他没有按计划回到新西兰,而是继续在中国和艾黎一起工作,并成为艾黎的“得力助手”,直到1953年(1952年),因为家庭的变故和未来尽孝道,他才不得不返回离开多年的故乡兰吉奥拉(Rangiora),着手从生病的父亲手中接过这家面粉加工厂。也许是由于自己的建筑方面的天赋和这么多年来在中国积累的建筑设计方面的经验,艾启赫在回国后不久就开始在兰吉奥拉边缘的一个两英亩(约合2公顷)的地段设计自己的房子。

18.尽管阿彻热爱中国建筑,但他认识到,十年前他所信奉的价值观仍然是对当地条件和传统最恰当的回答。从东向西延伸,单坡屋顶下的狭长矩形形状让人想起了帕斯科和普

利施克最近的作品,屋檐很深,北面的全玻璃窗通向一个长露台,阿切尔在设计开发过程中可能曾咨询过帕斯科(他当年在建筑设计方面的导师)。规划只能用简单和经济来描述:车库旁边的大门通向一个巨大的生活空间,里面摆满了普利斯切克设计的家具。宽敞的法式大门使人们得以进入后来变成了一个有中国风格的大花园。一个宽大的烟囱把客厅和厨房隔开,厨房后面有一间浴室,浴室的北面是一间单人房。在这里,艾启赫有机会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创新,如烟囱是由暴露在外的混凝土块和石头混合建造的,而在坎特伯雷,这种对实用材料的有意识的审美使用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了。后来的扩建项目,包括日光浴室、额外的卧室、一个扩大的厨房、第二个车库和一个工作室/工作室,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逐步增加,完全是同情的。

19.阿切尔住宅的特色部分源于其色彩的使用:房子外墙和车库门上使用的所有木镶板都被漆成了德斯蒂尔(Stijl)的颜色,红色、蓝色和黄色的飞机让人想起了西奥·范多伯格(Theo van Doesburg)在战争期间的作品。艾启赫对新西兰建筑的贡献是微乎其微的:一篇简短的文章提供了到1940年新西兰建筑的广泛历史和背景,以及至少一篇对20世纪中期坎特伯雷(Canterbury)住宅建筑的独特但未被认可的贡献。然而,这些贡献提醒我们,二十世纪中期这个国家的建筑思想并不局限于建筑界,而具有广泛兴趣的知识分子小群中的那些人也在寻找独特的、现代的新西兰建筑,以满足个人和社会对文化表达的需求。

另外:

1988年6月到10月间,新西兰历史学家及研究者喀麦隆先生曾经对Courtney Archer进行了多次专访,并记录为有关英国公谊救护队的口述历史记录,其概要整理如下:

a.讨论公谊救护队(FAU)以及新西兰和英国政府对该单位反应;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理由;对Quakerism的了解;家庭和社区的准备和反应;与Rewi Alley家人的联系。

b.描述经由加尔各答前往中国之旅和对中国的第一印象;红十字会和FAU的联系以及政府对此的反应。

c.描述他在曲靖作为麻醉师的工作和训练;捐赠美国陆军用品;生活和工作条件,包括休闲活动。讨论了转移到河南的原因;传教在中国的作用;FAU对福音派的反应。

d.描述从曲靖出发到重庆的旅程,FAU的组织 and 美军对中国人的态度。

e.描述上海的经验 and 行政工作;一些FAU成员的政治观点;贫富之间的鲜明对比;上海的政治活动和路易·艾黎(Rewi Alley)的政治化;与中国人的接触;与土匪遭遇的经历;对山丹培黎学校的印象、设施状况、其他在培黎学校工作的国际友人的情况、介绍路易艾黎(Rewi Alley)在培黎学校的角色、学校的声誉。

f.讨论他在合同到期后留在中国的决定,以及1952年离开中国的决定;回忆起路易·艾黎(Rewi Alley)1952年应邀在北京参加国际和平会议,以及他自己在组织新西兰代表团中所扮演的角色。

g.讨论山丹培黎学校教职工的成功和动机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描述山丹的解放和他与共产党士兵的第一次接触;评估山丹培黎学校和对山丹县城作为城市建设的影响。

h.评估FAU,并将其与其他分部、组织和任务进行比较,以及对其个人素质的影响;他在中国的经历的长期影响。

i.详细说明他离开中国的决定,并以培黎学校为例评估对中国的适当援助。

(作者秦泉安系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工合往事：陇上曾产百万条抗战军毯

口述人：王峙（榆中金崖文化站原站长）



一个小镇，一座早已消失的作坊式工厂，曾在抗战时参与了百万条军毯的生产。这个小镇就是兰州近郊的金崖镇，工厂就是抗战期间工合在小镇上开办的作坊工场。时至今日，小镇人并不知道，他们曾为百万条抗战军毯的加工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大片国土沦陷，民族工业遭受重大损失。为了支持前线抗战，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成立，联络组织小手工业，为抗战生产物资，最多时在全国设立3000多个合作社，有纺织、造纸、机器等20余种工业产品。1939年，工合

在甘肃的兰州、天水、平凉等地成立了事务所，建立了棉毛纺织、皮革缝纫等38个合作社，采取“社员集资、民主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原则，充分动员民间力量，为抗战前线生产各种用品。

1939年冬天，在兰州工合办事处700名员工的努力下，生产出了14万条军毯。产品上交后，国民政府军需总署又委托他们加工100万条军毯。这个任务主要由兰州、平凉、天水三地的工合合作社完成。这百万条抗战军毯是如何完成的呢？

第一批军毯：令人们吃了一惊

看到工合合作社刚制作出来的毯子，乡亲们的嘴就咧开了！你那叫呢子？军毯？差不多跟筷子粗细，中间还有大缝隙，怎么能保暖？看上去无法折叠，似乎也用不成。这能算军毯吗？

乡亲们对工合合作社的产品充满了怀疑。这是金崖工合合作社留给金崖老人们最初的印象。

当时，工合合作社就设在金崖镇内三圣庙，被称为第四合作社。为何工合要将合作社选在金崖，这还得益于我们金崖镇的地理位置和物产。那时，金崖是兰州往东第一大站，也是西北国际交通线的必经路之一。当时，金崖镇四周乡镇都有丰富的物产。榆中北山出产羊毛，青城一带种植棉花，这些都是纺织加工

的前提。自然,金崖相对发达的交通,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也是有利的条件。这样路易·艾黎就将工合合作社选址在了金崖。

镇子上的三圣庙是最好的地方。这座寺庙始建于光绪年间,金崖一带的群众又把它叫做老爷庙,占地面积达千余平方米。前面是临街戏楼,里面则有过厅,献殿。最早的大殿建于光绪二年,而比较晚的献殿则到光绪三十一年才建成。可见当时建设多么不易。庙内的建筑沿中轴线分布着戏楼、献殿、大殿,而在戏楼之间则是左右两排厢房。从建成至今,三圣庙就是金崖镇上最热闹的公众活动场所。

抗战时期,还在这里成立了中国童子军榆中县金崖小学校战时后方服务团,开展宣传抗战,募集抗日资金的活动。解放后,这里成为榆中县第五区区政府所在地。著名作家高平曾写了一副对联:“古庙沧桑,军政工学均用过;今人聚会,舞演弹唱更精神。”

工合设在这里时,正是1940年。当时,日寇飞机对兰州等地狂轰滥炸。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一些重要的学校企业就被搬出兰州。甘肃工业合作社的一部分机构就搬迁到了榆中。他们借用了三圣庙,不仅将其第四社设在三圣庙内,还在庙里设立工合金崖通讯处。

老人们回忆说,“工合”在金崖开设工厂主要是纺织,制作军毯。这个活可不好做。为啥?金崖以前会纺织的人比较少,但在抗敌救国的气氛中,参加工业合作社的金崖小伙子们还是努力学习纺织技术。现在看来,工合组织充分利用了中国农村广大的优势。他们大多选定相对繁华的集镇,然后分散加工集中生产。这样既扩大了生产,也团结了广大民众抗敌。

人们在三圣庙的左右厢房和献殿下面,大殿四周,摆放了织机。至今镇子上的一些老人还记得庙内写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标

语。当时,置办的机器分为两种,一种是铁织机,一种是木头的,自然铁织机的效率要高一点。除了在三圣庙内摆放织机外,合作社还在一些村民家里也设了点。

那段时间,我们金崖镇上很热闹。合作社将收购来的羊毛和棉花,分给愿意捻线的村民,于是捻线就成了镇子上的一道风景。不少人手里都提着一个纺锤,极速转动,细细的线就慢慢捻出来。为了提高效率,有人站到了房顶上。有的几个人合作,一个手提着纺锤,另一人手拿羊毛越走越远,线也就越来越长。最后,缠绕到纺锤上。

线纺好后,自然就是纺织。结果,第一批呢子就令我们金崖人大失所望。这样粗的军毯根本没办法使用啊!

谁知,合作社的人却不慌不忙,从容地进入了下一道工序。

铁刷子刷一阵:军毯就好了



保存完好的金崖镇旧民居

面对金崖镇乡亲们的质疑,合作社的人按照他们的工作程序一步步进行。先按照规定尺寸,将织成一匹匹的粗呢子,裁成一块块的。然后,用布在外面包边,以防脱线。完成这些工作后,就进入最重要的一道工序洗染。

一些老人回忆说,合作社的工艺并不复

杂。工合组织很完善,他们用的人基本上都是我们本地人。但是,对于我们而言,纺织还是比较陌生的工作,虽然有些人家曾织过布,但多是家庭妇女,而对于参加合作社的小伙子而言,纺织对他们无疑是个挑战。

无论如何,粗呢子算是织出来了。人们继续下一步工序,先架起了一个大锅,准备煮染。这也是土办法。将锅里的水烧开,放入紫花、槐籽、五贝子等东西,再将裁好的毯子放到里头。负责煮染的人,要不停地搅动锅里的东西,让它们受热均匀。煮好后,粗呢子就呈现出一种灰绿色。当时,中国军队军服的颜色也是五花八门,这也算是和中国军队的部分军服颜色基本接近。

此时,看上去粗呢子的品质依旧,缝隙依旧很大,或许是煮染的结果,好歹软和了一些。乡亲们关注的能否折叠、大缝隙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怎么办?

接下来,还有一道工序。等染过的粗呢子干了后,人们把它放在案子上,然后拿出一件钢丝滚子。这个滚子和其他的滚子不一样。一个粗大木头上,如同刺猬一般,布满了钢丝。其实,就是个圆滚状的钢丝刷。工人不停地用滚子在粗呢子上滚动。把粗呢子的绒毛全部疏松了,将原先留下的缝隙都填满了,而呢子也渐渐软和了。用钢丝刷刷完后,还有一道工序,工人师傅又拿着一个圆形的木头坨坨,后面有个把,在已经钩起绒毛的粗呢子上,不停地碾压,这样原本钩起的绒毛,就渐渐地压了下去,粗线也看不见,缝隙也没有。乡亲们看不上的粗呢子,渐渐变得美观了,好看了。

这样也行!原先,对军毯不满意的乡亲们说,嘿,你看!这毯子还不错。

百万条军毯运往前线:为抗日杀敌出大力

说起工合,自然就要说到路易·艾黎。路易·艾黎是著名的国际友人,也是甘肃省荣誉

公民。1938年8月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咨询“工合”工作的技术顾问。1940年在陕西宝鸡凤县创建培黎工艺学校。人们称他为“中国的十大国际友人”。

最初,工合的第一个地区办事处——西北办事处。第一家合作社是7名铁匠组成的。“工合”在陕西凤县双石铺,先后建立机器、造纸、制革、纺织、供销等17个合作社。甘肃工合开展比较好的是天水 and 兰州两个地方。天水的“工合”社发展直接受到了陕西的辐射。当时,天水事务所不仅组织了机器、火柴、面粉、油墨等工业合作社,而且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在秦安、甘谷等地开设分厂;在清水、张家川、甘谷等开展毛编织。

1939年3月,兰州工合事务所在兰州市东稍门下东关街路北(今庆阳路东段)设立。兰州事务所充分利用省会城市的优势,极力向四周辐射。不仅附设了军毯管理处、工合实验厂、毛毯纺织厂等机构,还在费家营、刘家堡、穆柯寨、盐场堡、岸门街、中街子、下东关等地设多个点。将一大批失业工人和不能维持生活的小手工业者吸引进合作社。我们金崖合作社可以说是兰州众多社中发展比较好的。路易·艾黎也曾到我们金崖镇合作社视察,鼓励人们努力生产,支援抗战前线。

我们金崖合作社生产的军毯,虽然没有大型工厂生产的军毯那样漂亮,但在中国大量工厂在敌后失陷的情形下,能生产出这样的军毯,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这也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甘肃人能为抗战前线所做的最大努力。

军毯加工完成后,人们就把他们打包,或者用骆驼,或者用马车,源源不断地往抗战前线运送。工合在甘肃的38个合作社不断地努力,为前线后方生产各种物资。有资料上说,当时,国民政府军需总署看了甘肃“工合”社生产的军毯后,对他们的质量感到非常满意,就

下达了生产100万条军毯的任务。这100万条军毯就由兰州、天水、平凉三地的“工合”社完成。

可以这样说,我们金崖镇的“工合”社是第四社,自然也承担了其中一部分任务。可惜的是,至今许多参加生产军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所生产的军毯就是这100万条军毯中

的一部分。

1944年后,合作社活动就少了,再后来散了。不过,乡亲们依旧在收益,工合不仅让他们得到了收益,也让他们有了一技之长。无论如何,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我们金崖人为抗战出了一份力。

(本文来源于《东方城乡报》2017.4.27)

新中国成立前 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招生简章

一、宗旨:本校旨在培育农村技师以合作社方式发展农村经济。

二、练习生入校资格:

1、练习生须经人介绍始得入校(如系本校童工中成绩优异提升者不在此限)。

2、介绍人:凡在校师生具备在校工作三年之历史者皆可介绍,校外人士介绍者则由本校练习生审核委员会酌情处理。

3、年龄:十三岁至十六岁。

4、性别:男女兼收。

5、文化程度:以小学四年级肄业或同学历为最低限度。

6、家庭背景:未婚,无家庭负担,以农村贫寒子弟为主。

7、体格:经本校医院检查合格

者。

8、初期试验:合于前述七条者方准作练习生。

三、练习生入学资格:

1、工作期限最少六个月。

2、工作成绩优良者。

3、课业成绩以能列入适当班次为原则。

4、愿献身“工合”运动者。

四、招收期限:于每年二月及九月各收一次,必得依本校经济情况减少或停收。

五、名额:每次招收练习生之名额视本校经济能力及分发至农村工作之学生人数多寡而定。

——摘自《培黎石油学校发展史》(1942-1992)第21页

凌 丽

“工合”引领抗战时期和平工业发展

黄少卿	广东和平县印刷厂	和平工合印刷社	同	上
徐名兰	同	同	上	
袁伟廷	同	同	上	
罗春锦	广东和平热水公社中兴大队	和平九连炼铁社	同	
王水成	广东和平热水敬老院	同	上	
王 添	广东和平县石油公司	同	上	
王石路	广东和平热水公社兴隆镇	和平九连工合炼铁社	同	
罗化育	广东和平热水公社联丰大队	低湖工合造纸社	同	
罗石通	同	同	上	
邹佛棠	广东和平县林业局	同	上	
罗 强	广东和平县热水公社中兴大队	同	上	①

和平“工合”部分成员名册

中華民國八年 九月

40 培黎通讯 2023·1

1939年春,中共粤赣边委和“工合”东南区办事处领导人,根据1937年冬罗响(方华)提供的情况,认为地处九连山下粤赣边境的和平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1939年3月,张石仁(共产党员,南雄县人)和叶荣健(曾留学英国,工程师)来到和平县,找到在国民党和平县党部任职的地下党员陈仁,由陈仁介绍与中共和平县委书记罗响联系,取得中共和平县委的支持,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平事务所”,主任叶荣健,指导员张石仁,中共和平县委派组织部长张觉青任秘书(后任指导员)。事务所一开始设在和平县城东坝街塘背巷赖屋,不久迁至大新纸行。

从事务所的建立到县联合社的成立,直至基层社的发展布局、人事安排、干部培训、经费筹划等,都是由中共和平地下党组织研究决定的。“工合”的活动,与党的地下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在中共和平县委领导下进行的。

“工合”首先选定有党组织和有群众基地的热水乡横坑、罗香洞和辣菜坑三个地方建立造纸社,其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1940年,基层社发展很快,在热水的同福坪、暗径、野猪窝和低湖建立造纸社,在眼坑水建立九连炼铁社;在青州、浏源、县城、合水、大坝、上陵、下车、彭寨、古寨、东水等地建立造纸、炼铁、石灰、伐木、砖瓦、榨油、供销、机缝、制鞋、雨伞、碾米、织染和棕笼等10多个不同行业的基层社;在连平县大湖建立石灰、榨油社,在新丰县石背建立炼铁厂。同时,派人在江西龙南县城建立“工合”指导站,由谢平波任指导员;梅县建立了“工合”指导站,建有皮革、抽纱等基层社。1940年春,为安置一批香港的失业印刷工人就业,在香港“工合”国际委员会任秘书的陈翰笙,写信给中国工合东南区办事处,建议在龙川县老隆镇建立印刷社,

并于当年冬天,在香港“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支持下建立老隆印刷工业合作社。不久,在和平县城成立了“工合”印刷社。



1940年中国“工合”和平印刷社创办时使用过的印刷机

这段时期,和平县先后建立了60多个基层社和工合指导站,统属和平事务所领导,社员共800多人。至1942年夏,经过整顿合并,20多个基层社中,60%建立了党支部,70%有党员,100多名党员对“工合”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

1940年秋冬,为适应“工合”大发展的需要,和平县成立了“工合”和平联合社,其权力机构是社员代表大会,执行机构是理事会,监察机构是监事会。陈仁为理事主席,叶吉祥任经理(后为王相文、叶金蝉),陈景文任副经理。联合社在老隆设门市部,在忠信设供销站,负责统筹各基层社的产品推销、原料供应和资金等业务。工合的业务蒸蒸日上。

县委领导捐出商行做“工合”厂房

清代、民国时期,和平造纸业很是盛行,年产土纸1000余吨,是山地村民传统的手工业,也是村民的第二产业,其系列产品——松香纸、东庄纸、玉扣纸、吊篙纸、油纸以及油纸制品阳明纸伞、阳明纸扇等,都曾通过水路,销往广东省内大部分地区并出口东南亚。

在和平县城金带路,有一间老字号大新纸行。纸行老板,是和平大坝镇的曾吉胜。彼时,日寇在广东沿海一带燃起烽火,沿海城

市相继沦陷。为避战火,曾吉胜的儿子曾源(曾镜湖)没法在中山大学继续求学,他返回和平,协助父亲打理纸行生意。在广州时,曾源秘密加入了党组织。回到家乡和平,他任县委宣传部部长,不久任和平县委书记。1939年秋,曾吉胜去世,曾源只得继承父业,经营大兴纸行。

1940年,当时的和平县委决定创办和平“工合”印刷社,需要购置厂房和机器设备。和平县委负责人与“工合”事务所领导找到曾源一起想办法,曾源当即作出一个惊人举动:说服另外一个大股东,把大新纸行捐献出来。另一个大股东是袁步岑,他同意了。二人一起筹资了4480块银元,创办和平县工业合作印刷社。

于是,大新纸行1500多平方米的楼房从此便做了和平印刷合作社。曾参与和平印刷工业合作社组建工作的陈景文先生回忆当时大新纸行的布局:地下左边(约占大房的1/3)是厂房和会客接见室;地下中间(约1/3)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平事务所”的办公室,地下南片为联合社的闹市部和会客室;地下右边约1/3为厨房、饭厅、储藏室。二楼全部是宿舍,多个单位的“工合”同仁同吃同住同办公。

大新纸行的义举,使和平县“工合”联合社提早成立,并以之为社址。同时,以大新纸行为联络点,形成了全县的“工合”网络,利用当地竹木资源丰富的条件,在粤赣边境的九连山组建了多个“造纸工合社”。

此时的原大新纸行,挂牌的有和平印刷工业合作社、中国工合和平事务所、和平工合联合社,还有不挂牌的“中共和平县委”。许多在异地暴露了身份而受到国民党当局注意的党员干部,都秘密转移到“工合”来,以公开职业为掩护,坚持革命斗争活动。

和平印刷社开业前的设备购置,还得到了县城“八一三”书店大股东陈荣中的支持。当时,陈景文前往书店寻求支持,颇具财力的陈

荣中拨付了200罐火水(煤油)价款给书店经理黄唯泉(地下党员),作为投资印刷社的资金,还以自己经营的运输公司的汽车借给陈景文等人到兴宁购回全套印刷设备。1940年夏,印刷社开业。

1941年秋,张华基任和平县委组织部长,在“工合”的掩护下,于和平城金带街租一小店,挂上“华记商店”招牌,经营当时闻名的东庄、尖皮、阳明三大纸张,以及笋干、冬菇、赣州红瓜等,转销老隆、惠州。同时,与共产党员黄唯泉经营的“八一三”书店密切配合,暗中推销马列主义等红色书籍。

培训干部与技术骨干支持党的活动

“工合”一经成立,就很重视干部与技术人员的培训。东南区办事处在江西瑞金举办了第一期东南区“工合”讲习班,全班59个学员,分配给和平的就有6个名额。地下党选派了谢平波、黄维翰、骆春山、叶景盛等4名党员和2名群众参加。学习结束后,颁发了由区办事处主任艾黎等署名的结业证书。第2期“工合”讲习班,地下党派卢镜波、叶金蝉、罗盛鉴3个党员学习。在赣州举办的机械培训班,和平县也有党员林镜清、罗春锦和群众罗大吉参加。1942年,办事处在南雄举办会计训练班,薛学文、邓德辉被派往学习。

“工合”和平事务所自己也开办培训班,1941年,在横坑、低湖办了两期造纸技术训练班,30多人参加;办了两期会计培训班,也有30多人参加。

从1939年到1942年,“工合”办事处先后在江西瑞金、赣州及广东南雄等地举办过多期讲习班、培训班、训练班,讲授机械、冶炼、造纸、会计诸类专业知识。

在“工合”成立之前,和平县只能生产质差价贱的草纸,后来已能生产东庄、玉扣、松香、土报纸和色纸等,畅销东江、兴梅、港澳等地。

港澳商人见有“和平工合”商标的东庄纸,即使价钱高点都要。

“工合”九连、碓金石、石背等炼铁社,由回国工程师曾纪章负责技术指导,生产土铁、灰口铁,制造各种农具和大小铁锅供应东江、兴梅市场,灰口铁供应赣州、韶关等工厂铸造模型。因为重视技术人才的作用,推动了基层社的发展,使和平“工合”进入全盛时期。

在财务管理制度上,经过培训的基层社会计人员把财务工作做得井井有条,保证了工合事业正常发展。在经济管理方式上,和平“工合”推行共负盈亏模式,员工在这种机制下激发出极大积极性。由于各基层社生产方向明确,员工生产积极性高,产品适销对路,和平“工合”不但保障了广大员工的生活,而且积累了大量资金用于发展生产和支持党的活动。

东南区办事处很重视和平“工合”的建立与发展。1939年冬和1940年春,路易·艾黎先后两次从赣州亲往和平视察“工合”工作,勉励和平“工合”全体成员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工合”事业的发展作贡献,还指挥大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1942年冬,粤闽赣“工合”办事处主任陈志昆到和平视察“工合”工作,徒步几十公里到大坝龙狮碓金石炼铁厂检查、指导。1943年夏,他再度到和平视察,并经和平到连平,后步行到新丰石背工合冶铁厂视察。

红色“工合”掩护地下党员

“工合”和平事务所作为抗战时期合法的社会生产团体,不但成为发展党组织的“摇篮”,而且成为隐蔽、联络各地地下党同志的可靠联络点。1939年春,刚建立的中共和平县委极为重视在“工合”发展壮大党组织,至同年冬,不但建立了“工合”党支部,而且在基层社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至1942年夏,已有100多名党员分布在各基层

社,在“工合”起着主导作用。

1939年冬起,国民党政府屡次掀起反共高潮,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根据党中央指示,逐渐转入地下活动,“工合”组织即在抗战时期起着掩护地下党活动的重要作用。和平“工合”联合社、印刷社成为和平地下党活动的基地,并一度成为中共和平县委机关所在地。1940年以后,在外地暴露了身份的地下党员,由后东特委转移到和平工作。如魏则鸣先在热水教书,后调联合社任辅导员作掩护,任中共和平县委宣传部长,后任县委书记;当时中心县委负责人李家良,以“工合”事务所助理员为掩护,领导和平县委工作;陈福仑在老隆、和平印刷社负责党的领导工作,后任县委特派员;周志和担任“工合”和平联合社经理等。中共和平地下党负责干部,都是以“工合”公开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中共和平县委利用地处九连山密林丛中的眼坑水的炼铁社,举办了两期党员干部训练班,由县委书记曾镜湖亲自主持,参加学习人数20多人。另外,1940年建立老隆印刷社以来,亦成为中共东江后方特委活动的重要据点。

和平、老隆印刷社除印刷日常用品外,还为地下党秘密印刷了不少文件、传单,如1941年“皖南事变”后,这两家印刷厂就为和平县委、后东特委印刷了一批《“皖南事变”真相》的宣传品分发各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人们称之为“红色印刷社”。

“工合”基层社的生产力甚强,除保障工人的工资福利外,还为地下党提供了大量活动经费,如1941年春,和平“工合”联合社一次就从10万元贷款中拿出1万元(当时可购2000担稻谷)交给党组织。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地处游击根据地的“工合”社成为支援、掩护人民武装队伍的坚强堡垒。在东纵第三支队挺进九连山后的整个

解放战争时期,活动于九连山的人民武装队伍得到这一带“工合”群众的支援、掩护,彻底挫败了国民党军对九连山的“清剿”与“扫荡”。

在抗战后期,和平党组织想方设法保住“工合”这个肩负着经济和政治双重使命的组织,使之照常运转,其中一些基层社如九连造纸社与和平印刷社,被完整保存了下来。和平县解放后,和平县“工合”印刷厂由县政府接

管,更名为地方国营和平县印刷厂,至今仍在正常运营。2017年10月30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授予和平印刷厂“工合血脉 红色基因——全国工合唯一现存红色印刷社”牌匾。前几年,该厂设置了历史展览室、工合印刷社纪念馆等红色纪念场馆,供民众参观。

(本文来源自来源《河源日报》社官方账号 2021.8.15,记者:凌 丽)

路易·艾黎和培黎工艺学校

申瑞英

笔者是甘肃兰州一所大学的老师,每天吃过午饭,都会去学校附近的培黎广场走走。在这里,我逐渐熟悉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培黎广场东北角矗立着一座巨大的雕像:一个俊朗的外国人面带微笑,一群可爱的孩子围坐一圈,脸上洋溢着充满希望的神情。广场北边有一面百米长、数米宽的浮雕墙,展示了这名外国人在甘肃呕心沥血培养人才的事迹。这名外国人叫路易·艾黎(Rewi Alley, 1897-1987),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西兰著名作家和诗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原培黎石油学校(现为兰州城市学院)创始人,曾为中国革命和职业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路易·艾黎出生于新西兰坎特伯雷地区的一个小镇,青年时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色,获得原威尔士亲王勋章。1927年,而立之年的路易·艾黎辞别家人,远渡重洋,来到上海公共租界工作。从此,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4年,路易·艾黎参加了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不久就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他参与过湖北水灾救助工作,冒险前往太原为中国共产党兑换钞票,联合国内国际进步人士援助中国革命,为上海秘密战线工作者提供避难所……路易·艾黎与中国共产党结

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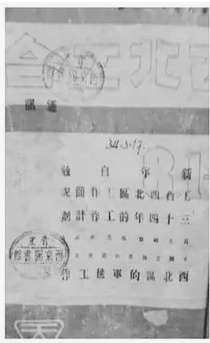
1938年初,路易·艾黎积极投身到抗日战争,为中国人民鼓与呼。之前,他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同为国际友人的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夫妇。当时,上海刚经历淞沪会战,工厂关门、工人失业,民不聊生。路易·艾黎深知,要打胜仗,离不开物资供给,也就是要实行经济抗战。在他和斯诺夫妇等人的不懈努力下,第一个促进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简称“工合”)在上海成立。之后,路易·艾黎先后前往香港、延安、晋西北、皖南等地,通过“工合”的工作,将人民组织起来,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的生产,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工合”的发展,管理和技术人员匮乏的问题逐渐显现。为此,路易·艾黎打算创办一种新型的职业技工培训场所——培黎工艺学校。“培黎”二字有两重含义,一是为了纪念长期在中国开展教育培训事业的美国人约瑟夫·贝利(谐音“培黎”),二是寓意“为中国的黎明培养人才”。

1940年,路易·艾黎来到陕西宝鸡凤县双石铺,在这里创办了一所培黎工艺学校。因办学条件艰苦,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学校前后有八任校长来了又走。直到英国人乔治·何克到来后,学校才有了起色。(下转58页)

“工合”双石铺事务所的成立及其贡献

凤县双石铺,战前原是一个小镇,人口还不到两千,但随着抗战军事的进展,由于它位居川陕甘公路交通中点,成为西北交通的重镇。同时秦岭山脉煤、铁等矿藏资源丰富,为了开发后方生产,支持长期抗战,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九月和十月,“工合”西北区办事处便在双石铺组织了钨铁社、机器社、造纸社和耐火砖社,以后又设立一个驻双采矿办事处。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四月,西北区办事处将陕甘采矿办事处改为事务所,负责双石铺区内所有工业合作组织推进工作。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四月,正式成立甘肃徽县和凤县黄牛铺两处通讯处,便利该区内各合作社对事务所的联络,加强事务所对各社的指导监督力量。同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曾派刘鼎、陈康伯、黎雪、赵一峰等从延安来到双石铺,帮助路易·艾黎研究西北“工合”发展计划,推进了“工合”运动的发展。



双石铺事务所自成立后,即努力从事组社工作。截止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四月底,合作社已发展到二十三个,社员三百六十一人,

社股三千五百五十四股,股金总额三万三千三百三十元。合作事业涉及有机、纺织、采木、制革、耐火砖、陶器、水力磨面、军鞋、泥木、缝纫、砖瓦、采矿、织布、试验等合作社,并有供销处一所。机器社能制造钢磨、机器、发电,使双石铺街市上首次有电灯照明,还能制造抗击日寇的手枪、步枪。当时,宝鸡、天水、陇南一带所需的生活日用品大部分是“工合”生产的,为大后方的军需民用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工合”技术顾问路易·艾黎在《关于工合生产技术的几点意见》中指出:“比较满意的是双石铺和成部仿制小型纺毛机的设计,这种设计将予甘肃和蒙藏边疆产毛区域的人民以莫大的希望”“除了宝鸡机器合作社,制造的织袜机、缝纫机、织背心机以外,双石铺机器厂是西北区唯一仅有的”。



双石铺事务所除了组社工作外,经常举办一些教育和训练工作,运用教育启迪民智,使民众对“工合”有明确的认识,并积极参加。在

双石铺先后举办社员训练班、妇女纺织训练班,训练妇女纺织技能,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此外,还举办了一所“工合”小学及附属幼稚园,除招收各社员工子女外,还招收当地儿童,使“工合”教育能与当地发展密切相联。



抗战时期,由于双石铺在西北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这里环山抱水,风景秀丽,人们称赞“双石铺是工合的天堂”。随着“工合”运动的开展,民国三十年(1941年),双石铺成立“工合”招待所,主任胡玉奇,辽宁人,所内共有大小房七十三间。同年六月,“工合”西北办事处妇女工作部也由宝鸡迁来双石铺,妇女部设在“工合”招待所的后院,职掌西北区妇女生产工作及妇女儿童教育推进事业。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五月,双石铺“工合”医院建立正式开始诊病,有院长、医师、男女护士和事务员共五人。医院房屋全系租用,有楼房两座,分挂号处、药房、诊病室、手术室、产房、病房等共十二间。香港促进委员会捐来大批药品器材,解决了医疗和防疫上的困

难。“工合”医院成立后,除正常门诊外,对紧急病诊随时就诊,每日诊病人数不下二三十人。据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上半年统计,办院一年时间,门诊病人四千零九十二人(群众一千九百三十八人),出诊病人二百五十二人,种牛痘八百七十八人,注射预防霍乱针二千零五十八人。“工合”医院与镇上行政单位发起双石铺公益建设委员会,共同统筹促进卫生事宜。同年,被赞誉为“工合的导师”、中国工合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与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英国友人乔治·何克在双石铺何家坪创办培黎学校,首次招生八十余人。学校的座右铭是“创造和分析,理论联系实际”。学校设有纺织、机械、化工、会计、外语五个专业科目。设基础课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由艾黎、何克、张思明分别指导教学和实习。



1938年至1944年,双石铺工合运动积极发展各类工业合作社,开展医疗、卫生、教育等公益事业,成为实业救国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埃德加·斯诺笔下的“模范工合城”,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本文来源自宝鸡档案2020.11.2)

代表新的中国的大使——路易·艾黎

弗兰克·罗伯特森

原编者按：作为一名专栏作家为不同报纸撰写有关战争的文章，撰稿人弗兰克·罗伯特森先生有幸从头至尾报道了涉及太平洋西南部整个区域的战争。去年秋天，他继续旅行，这次他踏足深入中国内地、游历了包括西藏和外蒙古等地区。在这篇他写给《星周报》的文章中，他讲述了中国在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中国甘肃山丹

山丹，是位于西北甘肃省境内的一个贫困的小村庄，那里曾经是除一片泥潭和荒野不毛之地，现在犹如一个巨大的城市，犹如现代城市上海一样耸立于此，一个大都市，现在正重新回到中国的地图上。伟大的成吉思汗大帝曾经统治过这座强大的城市，而今除了一些古老的寺庙建筑外，几乎没有什么遗迹。但如今在那些装饰华丽的神殿里发生的事情，对中国为实现民主制度而进行的艰苦斗争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当然，这也是当今中国最振奋人心的事情之一。

现今，极目所视，电灯在山丹城中闪耀，照亮了这座宝塔中有着1000年历史的发塔寺的古建筑。农民们从城北的山区下来，那里因山形成与内蒙古的边界。而城市南边则是连绵的山地，向南延伸与青海藏区接壤，夜晚可以凝望着那美妙的星光。

当他们看到在这座古寺庙及其周围发生的事情时，他们会眼睛发亮。

在这座古寺庙中，有一个巨大的佛陀冷漠地俯视着其面前一组崭新白色架子，架子上摆

放着成排的贴有标签的瓶子和试管。一盏电灯不协调地悬挂在佛像的头顶。而在他脚下地方，有一群健康的中国小伙子围着他们的化学老师。他们全神贯注，因为他们的农民头脑正在努力理解他们从未梦想过神秘事物。

在另一座寺庙里，三座较小的佛像构成了一个奇怪的背景，跟前矗立着高斯棉纺装置旋转纺纱机，这将把失去的一个重要产业带回了山丹，因为它的手动纺纱机无法再与沿海工厂的机器竞争。

每座建筑中都无疑存在着同样鲜明的对比，即山丹古城正在古老信仰和僵化习俗的象征之中获得重生，这种习俗使村民们可怜地贫穷和无知。不久，一个新的山丹将向中国各地的村庄选派派出经过学习有学识，并把进步带给全中国各地的乡村中。

1944年的一天，当一辆破旧的卡车驶进山丹东门时，就给这座古城带来重生和进步的机会。在城墙内看到一辆卡车本身就是一件大事，因为从兰州穿过新疆一直通向远方的苏联边境的大路曾谨慎的绕开了小城的围墙，似乎并不打算认同这里会有这样一个贫穷地方的存在。

第二件值得重视的事情则是,上述的这辆进城卡车坐着一个外国人,他身材魁梧,满头的淡淡的红头发,他还会说着与村民们一样的中国话,他们可能会因为言语交流的便利而把他当成自己人。这位陌生人去拜访了村长和村里的其他重要人物,他也花了很长时间在结冰的泥泞街道上闲逛(当时是冬天)。他好奇地问了很多关于可能出租的建筑物的问题,关于灌溉农田的系统的的问题。他还询问了有关可以用来制作陶器的粘土,以及山上含有铁和其他金属的岩石。此后不久,这里又陆续来了更多的卡车。

所有新来的人都聚集在老寺庙里,村民们也就很快知道,在他们贫穷的村子里,将要修建一所学校,去教学校里的中国男孩们学会如何切帮助更多的中国农民。这所学校名字被称为培黎工艺学校。那个满头长着红头发的外国人将负责这一切,他的名字叫路易·艾黎。

作为蓝图

艾黎先生是一名新西兰人,他于1927年来到上海度假,继续开始在中国居住,终于使得他的名字成为中国人共所周知的传奇人物,他一直与众多志同道合者一起致力于减轻中国数百万人所遭受的扼杀性经济贫困。

他曾在上海租界工部局的消防部门担任工厂首席检查员,到了1938年,他继而加入一组包括时任英国驻华大使的阿基鲍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在内的一小群人中,他们开始邀请一批有学识且经验丰富的中国朋友一道创立了中国的工业合作社。中国工合协会成立之主要目的是在农村建立众多的小型工业合作社,为支持中国抗日战争而生产。有幸的是,正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这最终将意味着数百万贫困农民有了新的出路。

在战火纷飞的时期,艾黎不知疲倦地工作,游历了整个自由中国,参与组织合作社,使得工

合运动迅速发展壮大行起来。经过几年努力,建立起5000个各式合作社,生产军毯、酒精燃料、纸张、肥皂、靴子、衣服和其他急需物品。同时,他还创办学校为合作社培训技术人员。学校取名叫工合培黎工艺学校,其中培黎的名字来自于美国传教士约瑟夫·贝利(Joseph Bailie)的音译,他曾参与创办了南京金陵大学,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中国农民争取更好的条件。

战争结束后,在中国战争中发挥了如此重要作用的各地乡村,在大批涌入上海、天津、北平和日本人腾空的其他城市的过程中被遗忘和忽视了,那里有相对舒适的生活和挣钱也比较容易。散布在各地偏远乡村的合作社数量从5000个锐减到500来个。兴办起来的学校也面临关闭,火热的培训也被淡忘了。多年来,艾黎和其他许多人无私的工作的成就被弃之不再重视,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民主,如今倒退了20年。

在中国工合(C.I.C.)国际委员会的支持下,艾黎不得不重新开始了一切。这一次,他要从早期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他现在知道,学校将要培训的人应该是那些将来会真正为中国工作的人,也就是远离大城市的中国边远乡村,这些人最好来自贫苦的农民家庭和农村。且最重要的是,必须向他们传授对人民的责任以及技术技能。

为了重新开始,艾黎把幸存下来的两所培黎学校都合并到了山丹的培黎学校。他之所以选择山丹作为校址,是因为这里曾经是一个贫穷的村庄(县城),让它恢复繁荣的漫长工作将成为他为学生们勾画的愿景蓝图,而且这也是构成教育的完整体系;因为这里远离城市(距离上海在1500英里之外);另外,还因为这里为学校自身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会;更因为这里及周围有学校自身发展所需要获得的大部分自然资源—煤、铁、铜、陶土、玻璃用沙子、造纸

所用的草、皮革和水力能源。

在最近高年级英语课上写的一篇作文中,学生张玉麟(音译)用简单的语言表达了学校正在努力完成的目标。

他写道:“我们为什么会相聚在山丹这样的地方?这里的交通很困难。这里冬天很冷。许多人宁愿住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大城市,靠近海岸。”

“但是大多数中国人都住在哪里呢?他们住在乡村。他们在那里出生,他们往往也会死在那里。因此,我们来到一个远离大工业的乡村工作和获得知识。”

“山丹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把能用于工业的所有东西都加以利用,山丹必将变得富有,许多其他的村庄也会同样变得富有。我们希望与农民一起工作,并与他们一起创造工业。”

目前,在山丹的培黎学校里,我们有220名学生,其中8名是女生。这里有一批热情洋溢的中外教师,他们辛勤工作,过着俭朴而充实的生活,为的就是看到一个伟大的想法得以实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外国教师都是无薪工作,而中国教师得到的薪水也很少。

大多数到学校参观的外国人的反应是“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那些本打算来学校短期访问的人往往会在学校逗留几个月。例如,这种情况就发生在沃尔特·史密斯(Walter Smith)身上,他本来是英国公谊救护队(FAU-Friends Ambulance Unit)的一名成员,一年多前被派遣到山丹来帮助建立了一家汽车保养和修理厂。他来了三个月,但如果被问到什么时候回家,他就会避而不答。很明显,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并不是所有的都被接受

另外,来自加拿大的丽娃艾赛尔夫人(Mrs. Reva Esser;中文名叫叶丽华),她是一位纺织专

家和来自新西兰的考特尼·阿切尔先生(Mr. Courtney Archer;中文名叫艾启赫),同样也是以为英国公谊救护队(FAU)成员,他们俩后来也都选择在此长期工作下来,比他们预期更长,甚至永久。同样的情况还包括来自加拿大的修·艾略特先生(Mr. Hugh Elliot;中文名叫严立地),他是一位兽医专家,他也是来了就打算长期待下去。随后不久,还有一个年轻的美国农业学家会来这里,他最近已经提出要来为我们服务。

这所学校的学生年龄从14岁到24岁不等,但并不包括其中有4名年龄更小的儿童,这四个儿童的年龄最大的才10岁,因为他们太小,暂时还没有到可以在宿舍里自己睡觉年龄。其中的3个男孩是孤儿,是被乔治·何克(George-Hogg)所收养的。何克是一个年轻的英国人,在艾黎去做其他工作时曾带人你山丹培黎学校的代理校长。两年前,何克不幸死于破伤风,学生们曾为他的死哀悼了数周。

并不是所有申请想来上学的人都能被山丹培黎学校录取为学生。申请者需要先接受为期六个月的学徒期,从事各种项目的手工作,并参加夜校课程。又有6个月的时间用于预备期。

一旦他们被学校录取,他们就必须准备在这里工作和学习至少六、七年的时间。这样,等他们完成整个的系统教育并结业后,才可以离开山丹。

学校的培训不限于一个行业或技术。对于那些在早期展现出对于机械感兴趣的学生将被教授钳工、铸造、铁匠、机床设计和构造、锅炉维修。此外,他还必须能够和同伴通过紧密的合作建造一个木屋或砖屋,他将掌握一些制革、纺织和其他学校项目的知识。他将学会说英语,特别是与他的工作有关的专业术语,并能承担简单的财务计算账目的工作。他将对他将要工作的地区的经济地理有所了解。他还要学会有关卫生学和疾病预防的基本知识,这样将来一

旦他的村子里的农民就不会依靠老虎的骨头来医治他们所有的疾病了。

除在学校学习文化知识和相应技术外,学生在从山丹培黎学校毕业后,将对他的人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责任感。他们的诚实程度将远远高于普通市民的平均水平。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在这么长久的时间里,艾黎对于他们所给予的无私的信任,因为艾黎曾经让他和他们带着一大笔钱到邻近的城镇去买粮食或汽油时。

山丹培黎学校的上课时间是早上7点,从早到很晚,学校整体都是个繁忙的地方。到处的车床和钻头在机器车间里旋转和研磨。用来做缝纫机和针织机以便从事棉纺和毛纺,这些机器是用来为学生制作服装。学校还正在修建一家医院,因为将有一名从新西兰来的医生在此工作。(译者注:后来是新西兰的救济组织选派了斯宾塞夫妇一起来此工作,开设工合医院(译者注:斯宾塞夫妇后来写了回忆录《中国的沙漠医院》)。

在学校的制革厂设在县城城墙的外面,在制革厂里,羊皮和羚羊皮被用来做外套和夹克,皮革被鞣制成鞋子——全校220名学生磨损了很多鞋子。附近还有其他车间,玻璃和纸张都是用当地的资源制成的。

在艾瑟儿夫人(叶丽华)的指导下,学生们编织出了带有1500年历史的古老图案的地毯。人们甚至希望在美国为这些精细的手工编织地毯找到一些市场。

学校安排其他学生,可从事加工面粉,或绘制地质图,或制作肥皂、墨水和书写用粉笔。学校也会安排学生们去参加娱乐很多,例如他们去打篮球、打棒球、游泳或滑冰,并徒步旅行到附近的山区。

县城里以及附件40英里外的村民和农民都可以在学校诊所(工合医院)免费获得急需的医疗服务。斑疹伤寒是该地区的地方病,沙眼

皮炎和肠道感染都很常见。

尽管培黎学校的建立给山丹带来的益处显而易见,但艾黎任然不得不与反对者和偏见作斗争。附近有些少数地方的富有的地主不希望农民受教育。在他们办学的第一年,他们四处向村民把当地所发生的每一次不幸都乱做解释,告诉人们说是神灵不再喜欢山丹,就是在那里建起了一所学校。

但艾黎确实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他已经与许多对手交上了朋友;但他仍然必须谨慎地慢慢引入变革。几个月前,他阻止孩子们扩大学校附近的小河池,尽管他们下河也只能游很短距离。他说,如果干旱使河水干涸,他知道学校会受到乡民的谴责,因为他们会说是学校得罪了水仙。

乐观主义者与斗士

夜晚降临,校园熄灯后,学校的教职工们通常会相聚到艾黎所居住的小房子所在的土台之上(叫擂台)。艾黎自己是一位热心的业余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他希望有一天能挖出被掩埋的城市山丹,他喜欢谈论曾经在擂台之上平坦顶部或曾举行的摔跤比赛。他甚至可以想象,那些倒霉的失败者被从房子后面的土崖上推下来,成为等待在擂台下面的野狗佳肴。

当大家闲谈不经意的涉及到金钱的时候,在艾黎住所这些晚间会议往往会变得阴郁惆怅,正如它经常做的那样。这所学校每月的预算约为1,000美元,而维持业务和经营,满足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需要继续坚持。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学校看起来好像要关门了。

但艾黎真是一个顽强的乐观主义者,也是一个天生的斗士;若不是两者兼而有之,他早就离开中国了。他也不允许个人的考虑妨碍他使学校成功的决心。几年前,黄河决堤时,他放弃了6个月的“积攒的回籍假”到河南做灾后救济工作。若只是为了自己健康,应该在离开中国的时候,让艾黎选择继续留在山丹工作,是对这

一崇高荣誉(HighestOrder)的自我牺牲。

他患有小肠消化障碍症(Sprue),这种病需要严格控制饮食,与山丹本地常有的食物完全不同。学校的教职工经常说,坚定的新西兰人待在中国会没有生意可做。他们还会补充说出他们的担心,即不知道没有艾黎的领导,学校会能否继续办下去。无论如何,他们意识到他们无法说服他离开。与此同时,艾黎也忍无可忍地接受了治疗。

几年前,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曾好心的派他到西康省的西藏边境去执行一项亲善使命的旅行时,艾黎则以他的机智侥幸逃脱了东方特有的不朽命运。

据说,在艾黎接受使命前去藏区旅行前,消息已经在当地散播开了,就像在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当他到达一个边境部落的村庄时,他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敬畏和尊敬。接待他的当地主人坚持让他穿上华丽的锦缎长袍。人们从数英里外的地方蜂拥而至,向他表示如法比拟的崇



1. 艾黎坚持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学方针。这是他在教授培黎学校学生修理内燃机

高敬意,艾黎感到不可思议。

当他们开始不顾一切跪倒在地的时候,困惑的新西兰人要求得到一个解释。他被告知说,他们认为他是活佛降临。据说,前不久,附近寺庙里的一个活佛死了,大祭司们决意认为,艾黎就是那个活佛轮回的真身。

佛教徒相信,一旦他们的精神领袖死亡,他的灵魂就会进入另外一个活着的人的身体。但是这次的情况是,他们对新佛身份的常规测试都没有成功,僧侣们各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他们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好使了。恰在此时,艾黎真人出现了。他是第一个访问这个地区的白人。显然,他们一直认为,艾黎就是他们心中的上帝所派遣来的活佛。

艾黎无论如何都不会承认自己会适合教会生活,他不得不不停地说话,坚定和固执地解释,以求自己脱身。最终,他还是成功的说服了周边的僧侣们,他们同意他必须先回重庆去解决和处理他的世俗事务,然后才能再来寺庙里居住。他急急忙忙的离开这个地区。

就人生轮回和永生而言,没有多少人获得了两次机会,但对于山丹培黎学校的学生和山丹的居民而言,艾黎确实在第二次尝试时成功了。

版权所有 1948;《星报》)

翻印:美国促进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IN-DUSCO, INC.)

地址:美国纽约 纽约16号;第四大街425号

合作:与美国支援中国联合服务社

简 讯

*2月23日,甘肃省话剧院举行话剧《艾黎在大西北》剧本研讨及工作推进会,路易·艾黎研究中心副主任董沼应邀参加研讨。

*3月25日,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第六届第五次常委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工合国际常委、路易·艾黎研究中心主任石虹参加。

*3月28日,《中国青年报》以《新西兰友人的精神成为校本思政资源》为题报道了兰州城市学院在课程思政中融入艾黎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成功经验。

英国人乔治·何克：把一切献给培黎学校

吴耀明

为正义留在中国

乔治·何克(George Hogg),1915年1月26日出生于英国哈彭登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是家中6个孩子最小的,1934—1937年在牛津大学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学生时代,何克就表现出富于冒险、独立思考的一面。大学训导主任评价他“有很多内在优良品德,有主见,知道往哪里去和该干什么”。1937年大学毕业后,何克跟随姨妈穆里尔·莱斯特(资深的和平主义者)环球旅行,游历了美国、日本后,于1938年2月到达中国上海。

在日本,何克看到当地民众对政府美化侵略的宣传深信不疑,把侵略说成是在帮中国建设“王道乐土”;而在中国,何克看到的真相是中国人惨遭屠戮、流离失所、饥病交加。他决定不再继续旅行,而是在中国实地了解人民面临的问题,将战争实情告诉全世界,他对姨妈说:“我不能丢下这些人们。”

预见一个新的中国

1938年3月,何克来到汉口,以外国记者的身份,将日军侵略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写成报道发往世界各地。何克认识了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进步人士,6月,在史沫特莱帮助下到延安访问,第一次接触了中国共产党。他看到这里没有特权,政府和军队官民一体、官兵一致,人民对团结抗日充满信念,干劲高、信心足,欢快的精神感染了全城,这种团结平等、朝

气蓬勃的精神深深打动着何克年轻的心。

1938年7至10月,何克亲历并向世界报道了武汉会战,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的《帝国操纵之我见》一文中,揭露了西方列强面对日军侵略行径,只顾自身利益、不保护中国人反而阻止中国军队行动的势利行为。



1939年3月,何克从北平前往晋察冀采访,路过曲阳县一家旅店时突染伤寒,恰遇新西兰护士凯瑟琳·霍尔救了他一命。何克在宋家庄诊所养病一个多月,看到这里的人们虽然缺衣少食、生活艰苦,但无一不投身抗战,顿时肃然起敬。康复后,应聂荣臻邀请访问晋察冀边区,他看到“自卫团”“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组织在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认识到人民是抗战的基础。他观察到,和国民党官员混日子完全不同的是,边区官员一直踏踏实实工作,帮助人民解决实际问题,由此对共产党心生敬佩,认为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9月,

到山西武乡八路军总部,受到朱德总司令接见,他还遇见了燕京大学英籍教授赖朴吾和林迈可,三人结伴南渡黄河后乘火车到达西安,林迈可由此回北平,何克和赖朴吾前往宝鸡。

通过几次采访,何克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更努力地报道中国人民抵御外辱的正义事业。除了给中外报纸和通讯社写稿外,他还把见闻写成书,1945年以《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为名在英国和美国出版,预告了必将诞生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他在书中写道:“西北是我考察新的中国诞生的理想之地,这里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惊人的创造力。”他还在另外一本未出版的书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带头使中国走向民主和抗战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何克不止一次地说,中国共产党是有前途的,他会永远留在中国,直到和中国人民一起把伟大的抗日战争事业进行到底。

把一切献给培黎学校

到宝鸡后,何克被任命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的外事宣传秘书。他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到陕西、甘肃、山西、河南等地考察合作社发展情况并写成新闻报道,为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工合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何克觉得这是一份“可以把工业和社会建设相结合的工作”,认为自己与工合“结婚了”。1941年7月15日,刊物《工合战士》上登出的《洋秘书何克先生》一文写道:“他(何克)负责起草各项英文报告与宣传文件工作,日夜不停地苦干……他痛恨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他不计报酬,不辞艰苦,愿为中国这个新兴事业——工合运动服务。”这篇文章反映了何克苦干实干的拼劲儿,也充分展现了“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

1940年,为了给工合运动培养后备人才,艾黎在陕西双石铺筹建培黎工艺学校,学校开办之初,由于条件艰苦、报酬不高,一年内有八

任校长离职,直到何克被任命为校长,各项工作才得到改观。何克一上任就带头修缮校舍,以身作则,发扬实干精神,学校很快走上正轨,呈现生气勃勃的景象。何克对学生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普遍尊敬和好评。他秉承学用结合理念,一边组织上课学习,一边坚持生产劳动,为中国工业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何克不仅担任校长,还兼任英语、音乐、体育三门课的老师,写了《培黎工艺学校校歌》,歌中唱道:“我们生活,我们学习,我们生活学习在培黎;工业技术都具备,求知生产不相离。”歌词生动反映了培黎“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办学宗旨。1943年,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访问培黎学校后,评价何克是“天生的教育家”。

1944年11月,随着日军西进威胁,加之国民党对培黎学校的监视迫害,为了学校和学生安全,艾黎和何克决定迁校到甘肃省山丹县。此时正值寒冬时节,何克带领师生们冒着风雪,翻山越岭,跋涉1100公里,于1945年3月抵达山丹。随后又投入到山丹培黎学校的建设工作中。直到1945年7月22日,何克因意外染上破伤风,竟然英年早逝,临终前,他写下了遗言:“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

何克一生未婚,却收养了4个中国孩子,并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艾黎对其评价道:“他是出于对中国革命的信念而捐躯的,他是中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的纽带,他的英名永存。”何克一生只走过了30年,但他不在乎功名利禄、放弃安逸生活的毅然选择令人动容,为正义而奋斗终生、为理想而无私奉献的崇高追求超越时代,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已经流芳百世,他的英雄事迹必然被中英两国人民永远怀念。

本文来源于《学习时报》2022.8.19,作者吴耀明,系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所讲师

新西兰莫瓦蒂亚河谷艾黎的小木屋

刘国忠

位于新西兰北岛塔拉纳基莫瓦蒂亚河谷的小木屋是新西兰仅存的、有关路易艾黎的物质文化遗产。艾黎的木屋被新西兰的历史古迹信托(Historic Places Trust)评估为第2级别的历史遗产,是人们了解一战后新西兰青年拓荒创业的重要内容,是新西兰的国家财富。莫瓦蒂亚的生活对艾黎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莫瓦蒂亚的生活,艾黎在晚年出版的自传中这样写道:“莫瓦蒂亚的生活给了我笑对一切艰难险阻的能力。它驱散了许多战争中的梦想,使我脚踏实地,并重新使我懂得艰苦朴素的价值。我开始学到许多斗争的知识和其他基本的东西,这对我后来大有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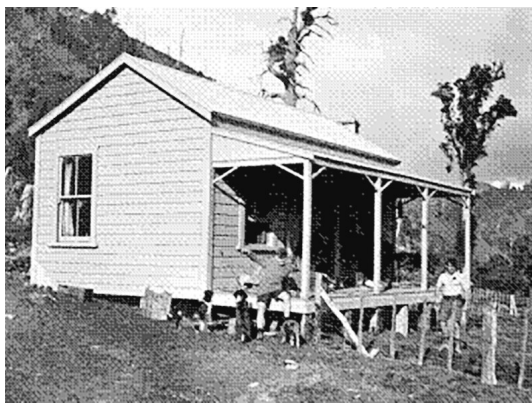
上世纪20年代,参加一战回到克赖斯特彻奇后,根据新西兰政府的复员军人安置计划,艾黎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外加他哥哥艾瑞克(Eric)(一战中战死法国)的战时积蓄和父亲给的一些钱,以及从政府获得的支持贷款,与一位曾在埃及当空军飞行员的高中同学杰克·史蒂文斯(Jack Stevens)合伙在新西兰北岛塔拉纳基(Taranaki)的莫瓦蒂亚河谷(Moeawatea valley)政府用于帮助参战士兵康复的农场,购买了一块800公顷肥沃的山地建牧场,开拓自己梦想的事业。他们购得的土地是北岛通往韦弗利(Waverley)的丛林路边约50公里的内地,一半以上的地方仍被森林覆盖。他们像奴隶般的劳动,有时一天要干

16个小时,养起了上千只羊和上百头牛。虽然莫瓦蒂亚的意思是“白天睡觉”,但艾黎他们在白天却很少有机会睡觉。他们要做饭,种菜,挤奶,做黄油,赶牲畜,砍灌木,烧肥田草,还要往陡峭的山脊上扛架围拦用的木桩等等。那时,他们的牧场属于偏远孤立的穷乡僻壤,常常只有他们两个人,如果一个人外出办事,那整个河谷就只有一个人了。



山谷里路对面山脚下的房子就是艾黎的木屋(1920年)

艾黎和杰克把住房建在了当地人称作“沃里”的一块狭窄的平地上,是一座非常简陋的小木屋。虽然牧场的生活很艰辛,但从山谷里可以俯瞰那条深水河和周围美丽的乡野风光。那里繁花盛开的拉塔树,鸟群,下雨天爬过山脊时赤裸的双腿擦过湿漉漉的蕨类植物的感觉,都给艾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艾黎(左)与杰克在木屋(1921年)

在牧场生活的6年里发生了好多起事故,艾黎也多次受伤。有一次,他伤的很严重,不得不在床上躺了3个月。在这6年的孤寂与奋斗中,艾黎亲眼看到自己生产的羊毛价格由每磅29便士下降到2便士,又逐渐提高到6便士和10便士。战后的新西兰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最严重的失业,经济日益恶化,人民生活困难。对于艾黎和杰克来说,他们一直要为每年挣足够的钱来支付购买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而奋斗。因为头两年生产的羊毛不能出售,他们只能靠打点零工或加工一些黄油到附近的城里销售挣钱补贴生活。显然,这样的收入要养活他们两个人还是不够的。因此,当杰克要结婚成家时,艾黎决定把那里的一切都留给杰克,而他自己决定前去一个被革命震撼的国家——中国。



艾黎在莫瓦蒂亚农场(1920年代)

从1927年4月21日到达中国上海,至1987年12月27日在北京去世,艾黎在华生活工作了60年,经历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60年的时间里,他发起了支持抗战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创办了培养技术人才的培黎学校,出版了多部著作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投身促进世界和平和友好的事业,特别是促进了新西兰与中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架起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人民友谊的桥梁。

1987年12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代总理李鹏就路易·艾黎逝世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我们敬爱的路易·艾黎同志在刚过90岁生日不久逝世,我们深感悲痛,谨向他在新西兰和中国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艾黎同志勇敢坚定、无私无畏,把他的全部心血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他还对促进中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起了重要作用。中国政府和人民深深感谢艾黎同志所作出的贡献。艾黎同志是新西兰人民的优秀代表,我们因为有他这样一位忠诚老朋友而感到骄傲。

新西兰总理戴维·朗伊在12月28日晚上发表的一项声明中高度评价路易·艾黎,称赞他是新西兰人民的骄傲。朗伊说,路易·艾黎从未停止过同中国人民一道为改变中国的面貌和实现现代化而奋斗。

1988年4月21日,在路易·艾黎纪念大会上,新西兰政府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协理部长弗兰·怀尔德讲话指出:艾黎是一个注重实际、说干就干的人。他的理想和活动可以作为今天中国和新西兰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一个典范。艾黎参与了建设新中国。于是,他也为修建把我们两国连接起来的友好合作的桥梁打下了基础。

艾黎把理想和实际的素质结合为一体,这

是很难得的。他带着开拓精神和人类能够战胜逆境的信念,从他在新西兰的牧场来到中国。

艾黎和中国人民关系密切,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吃了中国人民的饭,并荣幸地同中国人民一起工作。艾黎总有一个理想,而且总有实现理想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开辟新领域,需要有一种开拓精神。艾黎是新西兰和中国友谊的桥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艾黎在莫瓦蒂亚的旧居常常成为到山谷打负鼠和野猪的猎手们栖身的场所。木屋虽年久失修,但它的基本结构还保持完整。1980年,杰夫·查普尔(Geoff Chapple)出版的《中国的路易·艾黎》(Rewi Alley of China)重新燃起了人们对艾黎事迹的兴趣,艾黎在莫瓦蒂亚居住的木屋也受到人们的关注,有热心人也开始了保护和修复木屋的工作。因为艾黎在中国取得的成就以及木屋所代表的时代价值,艾黎的木屋被新西兰历史古迹信托(Historic Places Trust)评为第2类的物质文化遗产。1988年,来自奥克兰、对修复历史古迹充满热情的大卫·哈雷(David Harre)和曾参与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重建工作(1987年)、返回新西兰的汤姆·纽纳姆(Tom Newnham)用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奥克兰分会以及新西兰历史古迹信托基金旺格努伊分会(the Whanganui Branch of the NZ Historic Places Trust)捐赠的钱对木屋的屋顶进行了维修。大卫·哈雷后来争取到政府项目资助,与环保部自然保护队一起用六个月的时间对木屋按原尺寸进行了全面修复,同时还以同样的风格和材料在木屋后面建了单独的厨房以及供访客住宿的新房。1989年7月28日,时任环境部长菲尔·戈夫(Phil Goff)出席了木屋重新开放的剪彩仪式。木屋作为一所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场所重新受到社会的关注,它已成为新西兰的国家财富,是人们认识

艾黎、学习艾黎精神的重要场所。



艾黎的侄儿莫里斯和侄女菲利帕在艾黎的木屋(1988年)



粉刷一新的木屋(2002年)

如果现在要想去参观位于莫瓦蒂亚河谷艾黎的故居,体验河谷的生活,欣赏河谷的美景,就要提前做精心的规划,安排好时间,因为,每年5月到10月这里多雨,道路湿滑,为安全起见,这个时期只要下雨,去往莫瓦蒂亚河谷的道路都会封闭。

1992年,曾担任艾黎秘书的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艾黎研究室主任吕宛如,应邀访问新西兰期间终于如愿去看了艾黎在莫瓦蒂亚的故居。关于这次旅行,她这样写道:我住在新普利茅斯艾黎的堂弟迪(Digger Alley)家,为安排我去访问,着实下了不少功夫,准备的十分周到。我们一行十几人先乘小汽车到韦弗利镇,在那里换乘当地的小吉普车,到山

上一个指向莫瓦蒂亚的三岔路口下车,然后沿着又湿又滑的小路步行。

艾黎住过的木屋早已破旧不堪。1988年艾黎去世后,奥克兰的一些新中友协朋友发起组织一批年轻人志愿劳动,以艾黎的‘工合’精神,克服了资金、交通运输和技术上的种种困难,把木屋按原样修复,还加盖了可供游客使用的厨房,使它成了一所具有文物价值的艾黎故居。莫瓦蒂亚是如此美丽而宁静,远离一切尘世的烦恼与忧伤。但是,正如艾黎所说,人毕竟不能只靠风景过活。“作为一种经历的确很有意思”,但每天16小时砍灌木、架围栏、修公路、赶牲畜,还要自己种菜、挤奶、烧火做饭,年复一年地为生活而搏斗,就不是那么惬意的事了。有些中国朋友总认为一个来自物质生活富足的新西兰人,怎么经得起在抗战年代的困难条件下为‘工合’终年奔走劳碌;怎么能过山丹穷苦农民那种艰苦生活,想想他在莫瓦蒂亚的日子就不难找到答案了。

2002年,笔者作为路易·艾黎奖学金获得者赴新西兰学习,期间向新中友协的朋友表达了想去艾黎农场看看的愿望。经过新中友协塔拉纳基、旺格努伊以及北帕分会一些成员的精心准备,9月初,虽然不是理想的进入莫瓦蒂亚河谷的时间,但我们一行如愿抵达目的地。这完全得益于好的天气,没有下雨,加上精心准备了吉普车和山地摩托,虽然有些路段湿滑,但我们一路还是有惊无险。当然,这一行也让我们大家都切身地体验到了艾黎当年在这里生活的不易。这一路我们看到环境很优美,有茂密的灌木林,有河流,但进入河谷之后,一路基本上没有见到其他人。到达艾黎的木屋,看到木屋虽然经过了维修,但仍然很简陋。木屋有一部座机电话,但这里没有手机信号,明显感到虽然人类社会已进入二十一世纪,通讯科技有了很大发展,但这里还是远离

现代文明的地方。想想艾黎上世纪二十年代在这里生活了6年,而且,在艾黎离开这里76年之后,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里似乎依然如故,确实令人感慨万千,可见当年生活的艰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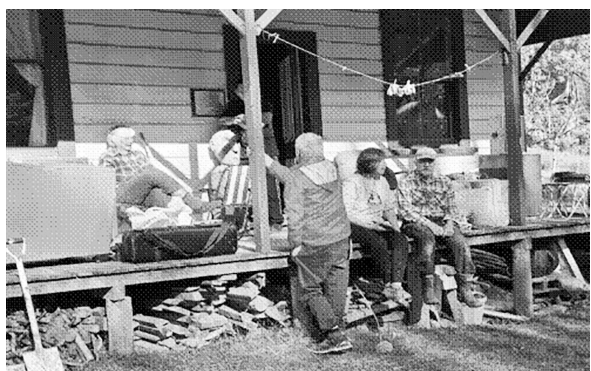


笔者骑山地摩托进入莫瓦蒂亚河谷(2002年9月)

2022年元月,原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艾瑞克·利文斯顿(Eric Livingstone)在北岛旅行期间,终于如愿以偿的去看了莫瓦蒂亚河谷艾黎的故居。对于此行的感受,他说:“天哪,这是一条粘土湿滑的路,在恶劣的天气里一定会非常困难。这么多年来多次谈到艾黎的木屋,今天终于能来这里真是太好了。”

“我们从这里得到的印象是,这条路很遥远,很难走,尤其是在没有车辆作为交通工具的那个时代,而且这里山路陡峭,灌木丛茂密。”

为了更好地保护艾黎的木屋,定期对这个木屋进行维护,经过多次与土地所有人的协商,2004年一个路易·艾黎莫瓦蒂亚信托(Rewi Alley Moeawatea Trust)成立了。从此,艾黎的侄子莫里斯·艾黎(Maurice Alley)和表侄女多萝西·韦茅斯(Dorothy Waymouth)承担起了管理和维护这个木屋的任务。到现在为止,他们每年都至少要到山谷去一次,对木屋进行维护。此外,如果有人要去看木屋,要在那里住一个晚上,体验那里的生活,就可以联系他们,获取房间的钥匙。



朋友去朋友去看木屋的多萝西(左1)和莫里斯(右1)(2021年5月)



到访者远眺山谷(2021年5月)

位于莫瓦蒂亚河谷的这座小木屋,是现在新西兰仅存的艾黎的故居,是有关艾黎的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存在不仅可以使人们感受艾黎当年的生活,理解艾黎脚踏实地、坚忍不拔的工作作风的形成,学习艾黎艰苦创业的精神,木屋同时也提醒人们,新西兰那些参加一战后回国的战士,在康复农场拓荒创业所经历的孤寂且远离文明的艰辛生活。

2022年5月于山丹

(作者刘国忠系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常委,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高级讲师,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上接44页)后来,西北局势紧张,学校朝不保夕,不得不迁移。迁往何处?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二人冒着战火在陕西、甘肃、河南等地走访考察,何克曾这样描述那段岁月:“翻过高山、推过推车、沿黄河步行……虽万苦千辛,却自得其乐。”革命者的豁达乐观,令人敬佩。

1943年夏天,路易·艾黎陪同英国科学家约瑟夫·李约瑟博士去甘肃玉门油矿讲学。途经山丹时,他发现这里民风淳朴、资源丰富,远离战争前线,又是红军战斗过的地方,是办学的“希望之乡”。1944年,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带领学生和工人,用马车拉着各种设备,将学校西迁至山丹,更名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山丹培黎工艺学校”。

在山丹,路易·艾黎有一段辉煌的办学经历。他认为,发展分散的乡村工业是改变中国落后状况的重要途径,提出了“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办学理念,探索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

半工半读、手脑并用的新型教育。

在办学实践中,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充分利用山丹的优势资源,设立了机械、煤炭等二十多个专业和生产小组,办起了纺织、制扣、玻璃、造纸等27个校办工厂(场),践行着“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办学理念。这正如山丹艾黎纪念馆陈列的《培黎工艺学校校歌》所唱:“我们生活,我们学习,我们生活学习在培黎。纺织制革、钢铁机器、工业技术都具备,求知生产不相离……为新中国奠定工业建设的石基。”

几年间,培黎工艺学校对当地的发展和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山丹的第一所西医医院、第一台榨油机、第一辆自行车、第一个玻璃厂、第一台发电机,等等,都与培黎工艺学校密切相关。山丹解放前夕,学校调拨卡车帮助运送解放军。山丹解放后,学校学生奔赴全国各地,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

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报2023.2.21

缅怀路易·艾黎老师

周启秀



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养吾(右),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彭德怀的秘书,向艾黎的学生周起秀(左)讲述彭德怀对艾黎的评价

1930年我生于山东金乡县,七岁前在城里上小学,日军攻城前逃往乡下。县志记载,城破未及时出逃者,遭日军杀者达三千余人。

在乡下我随杨家六表叔读“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孔孟之乡读儒家主要经典,跟旧时戏班学戏类似,要求严苛,背书不流利就要挨打。

1941年11岁,我毅然背起背包,加入八路军在湖西边区抗日根据地办的湖西中学,成为最小的学生之一。校长是杨家四表叔杨经元,学校经常跟随八路军湖西专署流动,我行军从不掉队,练就一双铁脚板,不然难于日后逃难。

老师中有参加“一二九运动”,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的人,从学校举办的鲁迅文学展览中,令我眼界大开,对充满矛盾的现实进行思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到之处,从

家的门联看出,处处是流传的儒家风俗。许多中年妇女仍是裹小脚的人,行动不便。回忆《论语》一书,讲到“仁”字的不下百处以上,什么是“仁”?无非就是仁爱,能同情爱护和帮助人,有宽厚的仁爱之心,但居然一方面大讲仁义,一方面背道而驰,千年风骨难改,把女人的脚裹住,日军一到,跑也跑不快,正合了日军的意,居然还有恬不知耻的文人称裹足风气是“中国国粹”。再看那龙的传人所在地皇宫。鲁迅说: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二心集)最不仁不义的地方就在龙的传人争夺一把龙椅的皇宫,那里有众多割掉生殖器的太监,有终生难嫁的宫女,惨无人道,猪狗不如。公猪公狗都从未如此对待过同类。

一九四二年秋,行军到江苏丰县地界的一个大镇,停了下来。学校开饭前,要自己分头向农家借碗。我刚走到一家门外十几步远处,忽然跳出一条大狗,把我扑倒在地,下口猛咬,在我右腿关节处咬出两个洞,鲜血直流,幸亏有人闻声把狗赶走,留下一命,但已不能随校转移,学校派一辆轮车把我送回家养伤,秋末冷风一吹,日军开始三光大扫荡,人们夜间躲在村外,只见村里火光冲天,日军走后,家中衣物一片灰烬,到邻村一看,真是惨绝人寰。连小孩小猪的肚子都被刀刺挑了,村中树木一片

焦黑。无奈之下,开始踏上千里流亡之路。

行至洛阳火车站,只见黑压压一片,火车顶上挤满难民,车下轮轴上也有人,车停在刚卸下的炭火上,只听一片惨叫。难民上车不用买票,西安城外到处是难民,学生难民当时有的去四川国立中学,有的去西安附近的辉县国立中山中学,公费包食宿。我去了辉县中山中学。

双石铺

一九四五年六月,我在双石铺见到艾黎。介绍人是西北区工合负责人卢广棉。初次见面,对艾黎没有陌生感,他平易近人,我感到很亲切。那时培黎学校刚刚迁往甘肃,艾黎是从四川处理一些事务回来,在双石铺短期停留。每天中午,在他带领下在嘉陵江游泳,他说,河滩上那个小院,是从东北流亡至此的张玉麟、张玉琪父亲居住的地方,河西岸边的土窑洞,是他和何克住的地方,河滩东侧的水轮机,是果工程师设计建造的,河东岸上的那片房子,是原培校校舍,他指指点点,领着到处看看,并一一作了介绍,使我了解不久前的情况。



艾黎在双石铺创建的培黎工艺学校

兰州

那时交通不见客车,只有卡车,六月下旬,随艾黎坐在卡车上,经两当、天水、通渭到兰州,兰州培黎学校位于黄河北岸穆柯寨,离岸大约一里地,岸边是一片果林。艾黎住在面对皋兰山的坡地小房里,放眼望去,皋兰山尽收眼底,他让我留在兰州,以后再去山丹。兰州培校上午上课,下午实习。下午我的实习地点

是细木工和翻砂。木工是制作铸造机器零件的模型,翻砂是把模型放在沙子里,取出木模制造零件。

我万万没有料到,这点手工活日后大派用场,十年涝劫下,放到江西干校,分配我当木工,没有把握,去向当地老木工请教,木工要三年学*才行。无奈之下找些木工书看看,摸索一练,水桶也可造出。体会是:“手脑并用,创造分析”可行。回来后家具都是自己做的。

漫步兰州街头,发现有摆地摊出售鲁迅的书,学校图书馆也有不少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书,其中也有不少鲁迅的书,街上偶见有丰子恺的画展,很喜欢他的画。听艾黎谈起敦煌千佛洞,我梦见石窟艺术品琳琅满目,洞内十分敞亮,不久我真去了哪里,才知光线不好,只在上午才能看清壁画,梦想总比现实美好。

艾黎从不强调“师道尊严”,而是“润物细无声”。从不居高临下,而是平等待人,所以他作为教育工作者,从不动辄训人,或者动辄恶语相加,而是坦诚待人,不是居高临下,正如他英文讲义中多次出现的词:common man 普通人,他就一生做着普通人,不拿架子,装样子。

在兰州,午饭后,往往随他一道越过一片果林去黄河水车旁游泳。一天,他谈起第一次世界大战,说他受过伤,子弹正打在屁股上,在右侧,往下一点,说着说着停住脚步,解开裤子让我摸摸在什么地方,我不知这子弹对他的生理上留下什么后果,这是医学问题。

艾黎喜欢带学生远足旅行,开阔视野,在没有寒暑假的时候,他组织外出旅行,消息引起学生们的很大关注。但很快希望破灭,因突然传来坏消息,何克患破伤风病危,艾黎急忙到山丹去了。我在兰州不足半年,艾黎叫我去山丹。

年深日久,有的文献上记载谷会文去山丹的时间有误。谷会文工程师是山丹机械的首

聘工程师,去山丹的卡车上,他和夫人坐在司机驾驶室,我一人坐在露天的卡车上,我身上只有单衣,临行前,我在兰州的表哥张依湘给我一件毛背心,车过乌鞘岭的时候,我冻得直打哆嗦。正是浑身发抖,让我记住了时间,谷会文去山丹应在1945年秋末冬初。

一到山丹,衣服有了,身心都温暖了,因为山丹有艾黎。

(本文来源自兰州城市学院微信公众号
2017.4.14,作者周起秀系培黎老校友)



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养吾(右),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彭德怀的秘书,向艾黎的学生周起秀(左)讲述彭德怀对艾黎的评价

《培黎石油学校发展史》(1942-1992)序

康世恩

提起培黎石油学校,人们总是要联想到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回想起他在1942年那样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同英国记者乔治·何克一起,为支援反法西斯斗争,在中国偏僻的西北创办培黎学校的感人情景。

记得我第一次到培黎学校同艾黎见面是1949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兰州。在向大西北进军的途中,彭德怀司令员接到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命令西北野战军要保护好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创办的甘肃山丹培黎工艺学校。那时,我所在的西北野战军第九师是先头部队。彭德怀司令员就将周恩来副主席的命令交给九师执行。于是,我带了一支队伍急行军赶到山丹县,很快找到了培黎工艺学校和艾黎校长。我当面向路易·艾黎校长传达了周恩来副主席的命令,并告诉他,我们是奉命来保护培黎学校的。当时艾黎校长百感交集,感动得无法形容。我看到学校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窑洞里的桌、椅是用挖窑洞时留下的土台子代替的。但是他们很乐观,还把土台子雕凿成沙发的形状,上面铺上毛毡,成了别具风格的“土沙发”。为了保护学校,我们专门起草了布告,贴在学校大门上,要求后续部队给予保护,并留下一个排为学校站岗。随后大部队到达山丹县,

许多缴获的车辆,有的急需修理,有的急需人去驾驶。艾黎校长组织培黎学校的师生员工大显身手,坏的车辆全部包下来修理;没人开的车,学生上去就开起来了,帮助把部队一直送到酒泉。培黎学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学校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培黎学校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所技工学校。近50年来,为石油、石油化工和其它工业战线培养输送了中等专业毕业生1200人,技术工人近六千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培黎学校从创办起,在艾黎校长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带动下,形成了一套优良传统和学风。这就是对党、对社会主义忠贞不渝的坚定精神;艰苦奋斗,脚踏实地,勤俭办校的苦干精神;手脑并用,课堂教学同现场实践紧密结合的创造分析精神;为人民进步事业不怕艰辛,不计得失,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这些优良传统和学风是培黎石油学校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祝愿培黎石油学校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传统和学风,进一步办好学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建设人才,为发展中国的石油工业作出新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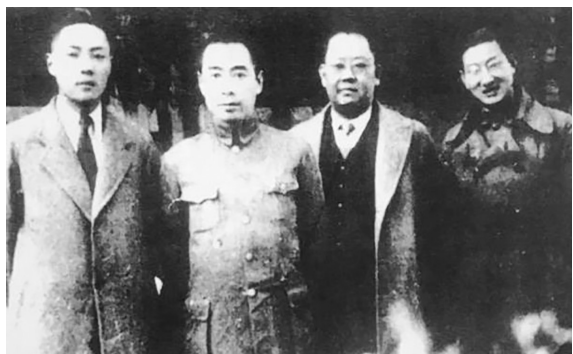
中国工合金华机械五金生产合作社证章

婺道斋



中国工合金华机械五金生产合作社证章
(20世纪30、40年代)

2018年12月,承好友帮助,获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金华机械五金生产合作社证章一枚。该章中心为“工合”二字的红底白字标志,上方为合作社名称,下方有步枪和笔交叉造型,寓意文武相济,发展生产,抗战建国。



1939年,周恩来同志(左二)与工合浙皖区办事处主任章秋阳(左三)及刘良模(左四)等同志在浙江金华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及爱国进步人士宋庆龄、胡愈之等发起,于1938年8月5日在武汉成立。路易·艾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技术顾问并代理全国“工合”总干事,负责全面组织工作。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兼任理事长,宋庆龄为名誉理事长,中共领导人林祖涵、董必武、邓颖超和国民党政权的王世杰、张治中以及国民参政会的沈钧儒、黄炎培等各界人士共20多人为理事。工合通过召集失业工人,流亡难民,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下,组织起来,兴办各种有利抗战的工业、手工业合作社,发展生产、粉碎日寇经济封锁,解决千百万流离失所频于饥饿的难民、伤兵的劳动就业,安定后方秩序,支持抗日斗争。

1939年1月,“工合”东南区办事处在赣州西津路中华圣公会正式成立,艾黎兼任主任,负责组建和指导江西、广东、福建、浙江、安徽五省的“工合”工作。

1939年3月,艾黎从赣州到浙江金华,找到他的好友、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刘良模,谈到开展浙皖“工合”运动,经刘的推荐与在金华的浙江《东南战线》总编骆耕漠(时任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商谈。骆耕漠将“艾黎筹建浙皖办事处的意图向中共浙江省委作了汇报,省委指示:一定要抓住这个

组织,具体的要按他(指艾)的办法去做,要作为我们统战的社会团体,这是个难得的外围组织。当时,周恩来从皖南新四军军部返回,由国民党经济部中国茶叶公司驻皖办事处主任章秋阳(又名章郁庵,为周恩来派往皖南工作的中共党员)等同志陪同到金华,对浙皖“工合”的筹备工作作了具体的指导。

1939年7月,“工合”浙皖办事处在屯溪中山正街还淳巷5号正式成立,章秋阳任办事处主任。成立之初,浙皖“工合”办事处属“工合”东南区办事处领导。东南区办事处对浙皖办事处工作非常重视,不仅汇来49000元经费,还于1939年12月派组织课长孟受曾(中共党员)到浙皖视察。

为培养“工合”干部,“工合”浙皖办事处在安徽屯溪举办了第一期“工合”干部讲习班,章秋阳和骆耕漠分别担任正副班主任。学员大多是上海、浙江、赣北转来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也有部分从新四军调来的军政干部,还有一些是从金华和屯溪当地召来的青年,总共有100多人。讲习班除开设有关合作经营、工业技术方面的课程外,还学习国际形势、中国经济、军事常识、抗日纲领等。讲习班内还建有中共党小组,不少学员在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讲习班结束后,这批学员分赴各地,大多成为各地“工合”组织或抗日力量的骨干分子。此后,兰溪、永康、云和、临海、常山、衢县、淳安等地都建立了“工合”事务所或指导站。

1940年2月,浙皖办事处主任章秋阳病故,“工合”东南区办事处委派孟受曾接任办事处主任职务。为了更好地与新四军联系,推进皖南地区“工合”运动的发展,艾黎以东南区工作范围太大,不便领导为由,于1940年11月决定将浙皖办事处从东南区中划出并上升为区级办事处,把东南区办事处改为“赣闽粤”区办事处,同属总会领导。

1941年3月,“工合”浙皖办事处迁至浙江金华河盘桥下庙,正式改组为“工合”浙皖区办事处,孟受曾担任办事处主任。在屯溪设立分处,孙季实任主任。办事处改组后,除继续负责兰溪、丽水、屯溪、泾县、太平等事务所及皖北立煌、岳西等地的工作外,又在云和、常山、永康、衢县等地建立了事务所,在兰溪、临海、休宁设立指导站,并在兰溪设立浙皖区“工合”金库。1941年9月,根据产销业务经营的需要,将兰溪工业生产合作供销经理部改为“浙皖区工业合作供销业务代管处”,孟受曾兼经理,并在丽水和屯溪分别成立了代管分处。

“工合”在浙江的发展计划是建立以兰溪为主的机械、纺织中心,以丽水为主的油脂中心,以临海为主的渔业中心。在浙江的“工合”事务所和工业生产合作社中,都有中共党员直接参与或领导,淳安机器生产合作社还建立了中共支部。

萧山沦陷后,浙东吃紧。1940年3月,“工合”兰溪事务所组织了一次抢运行动,即将一部分机器和技术工人从即将沦入敌手的宁波抢运出来。这次抢救出来的机器不下四百多吨,技术工人、家属三百余人。他们到了兰溪、金华等地后即组成机器、钢盔、服装、刀剪、药品、皮革等工业生产合作社。其中规模最大的淳安机器生产合作社,主要生产榨油机、机床、老虎钳、印刷机、打面机等,此外,还兼顾机械修配,同时也为新四军生产武器,如捷克式轻机枪、弹夹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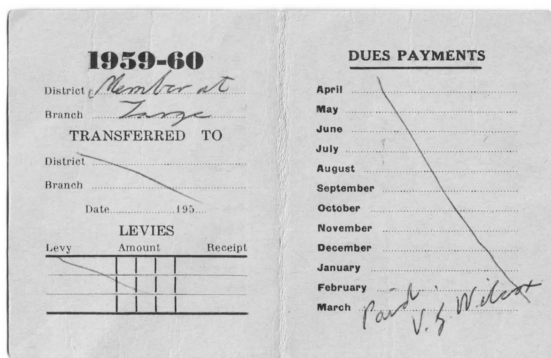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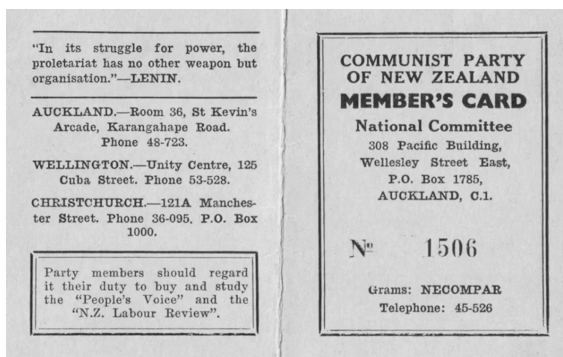
浙江的“工合”运动,为安置难民、解决就业,促进工业生产发展,支援新四军抗日做出了重要贡献。1943年底,国民党压制破坏“工合”运动逐步升级,至1944年,浙江的“工合”组织大多停工或解体。

(本文来源自黎道斋美篇2020.4.8)

路易·艾黎的新西兰共产党员党费证

赵谦玺 陈琴

近日,山丹艾黎纪念馆资料整理人员发现三张硬纸制作的卡片,经请教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副会长李建平先生,确认是路易·艾黎的新西兰共产党员党费证。



2016年,我馆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移藏的艾黎相关资料里,有多份简报中说“路易·艾黎是新西兰共产党员”。路易·艾黎是何时加入新西兰共产党的,除简报外再无其他凭据。研究人员先后向当时与艾黎工作和生活的李建平、聂广涛等求证。这次三张党费证的发现,将是路易·艾黎加入新西兰共产党的直接证明。

党费证为9*14厘米对折卡片式证件,两张为浅绿色,一张为粉红色。时间分别为1957-58、1959-60、1965-66三个年度。封面印有新西兰共产党党费证和编号,内里是地区、部门、数额、月份等常规内容,封底为列宁语录“无产阶级在争取权力的斗争中,除了组织之外,没有别的武器。”和对党员的义务要求“党员有义务购买和学习《人民之声》和《新西兰劳工评论》”。

这三张路易·艾黎新西兰共产党党费证的发现,将为进一步研究其相关历史提供新的史料依据。

(本文来源自山丹艾黎纪念馆微信公众号2022.5.20,作者赵谦玺 陈琴系山丹艾黎纪念馆工作人员)